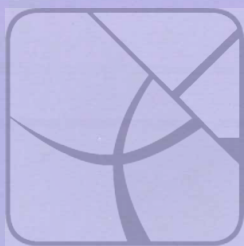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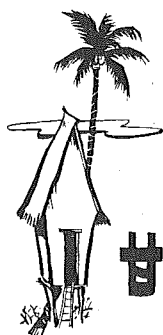
有闲集



林言

有闲集

林
言



甘榜云版社



有闲集

作者：林言

出版：甘榜出版社

11-B, Pekin Street,
Singapore, 1.

承印：新的印务公司

定价：星币一元正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目 录

我们要美好的下一代	1
读《马来亚古今谈》	6
充满希望的世界	12
介绍几部日本小说	18
《不落的花朵》读后感	25
还孔子本来面目	29
杰出的《黑珍珠》	35
我读《开埠前的新加坡》	39
高尔基与造神说	48
试评《在底层》与《夜店》	57
漫谈《水浒传》	70
后记	80

我们要美好的下一代

我没有孩子，可是喜欢孩子。我喜欢观察他们，看他们吃饭，看他们游戏，看他们念书。

我时常被孩子们的天真逗得合不拢嘴。有一回，我抱着一个孩子在走廊上散步，望着楼下模糊的景物，我问他：

“我们跳下去好吗？”

孩子摇摇头答道：

“我不要！下去了，我不会坐电梯上来。”

我的邻居的一个孩子，临睡前一定要抓着她母亲的耳朵才能入睡。

孩子们是天真的，做父母的望着他们，就能消去一天的烦恼的。

可是，更多的时候，我替孩子们担心。每次，当我去探访哥哥时，嫂嫂总要叫孩子们唱歌给我听，可是唱的是什么呢？今天不回家、负心的人、无情的火车等等。

我的心是痛苦的，可是做父母的却洋洋得意。

当夕阳照亮了电梯的那一角时，我也拖着疲乏的身躯回到家来。然而，走出电梯，要格外小心：过去是詹士邦的枪作怪，现在是飞刀与飞镖横行。

社会风气不好，孩子们自然多少会受到影响，这不是单独家庭教育所能彻底解决的，可是只要父母能时常加以指导，孩子们长大了仍旧是朝气蓬勃的一群。

报章杂志上经常有登载一些科学的教育方法，譬如不要恐吓孩子，不要宣传迷信，不要欺骗孩子，都是能帮助

孩子们健康和正常的长大的。我身边有一本《母亲手记》，是苏联的一个女作家赛尔盖也娃的作品。这本书与其说它是生活的实录，毋宁说它是一部生动的教育理论书。

序里面是这样介绍这部光辉的作品的：“书中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细节，都洋溢着现实主义的精神：在平凡之中，见出伟大；在狂热之中，见出纯真。……我希望这一本书能成为……新一代的指路碑，能够在许多父亲、母亲或儿女中间，发生教育的影响，使二十世纪人类的新精神，能够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

这本书分成两个部份，虽然时代背景不同，可是都洋溢着共同的儿女亲情，突出了共同的生活目标。

让我举几个书中的例子：

有一次，作者的母亲吩咐她到邻居去传口信，叮嘱她：“首先讲：‘你好’。”

可是当她走到邻居的门口时，不敢进去。告诉了母亲之后，她没有骂作者，只是说：

“如果一个人做不到，两个人去做好了。”

另有一次，一个邻居的小孩开了作者家里的门，走进屋内以后，害怕得一句话都说不出。作者的母亲走近他，亲热的抚摸他的头发，微笑的说：

“你好，母亲叫你来说些什么？”小孩受鼓舞了，终于完成了任务。

作者叙述了一个流浪者的遭遇，这个流浪者每次经过他们那里时，孩子们一定跟在后面用脏东西掷到他的身上，做种种的恶作剧。可是作者的母亲却给他面包，庄重而温存的和他谈话，给他生活的力量与决心。后来，村里

的孩子们也都改变了态度；作者的脑海里也时常有帮助他和护卫他的愿望。

作者又怎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呢？

“从孩子们七、八岁起，我便开始带他们到美术馆去。在任何一次，我们都只停留在很少的几幅图画前面，但对每一幅都看得很久，并尽量设法找出上次所未发现的东西。我用自己的话详细地说明画幅的内容，力图使孩子们体会到美丽的快感，懂得艺术和生活的一致，使他们在艺术中找到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的反映，载在自己的学校采集册中去。……”

“随着孩子们的长大，我的有关图画和画家的叙述也复杂起来，我细心地研究着一些艺术家的传记，以便对孩子们说明他们的创造性的忘我活动。我把一切讲给孩子们听，为的是要他们明白：‘我们应当不屈不挠地去学习这种高度的勤勉。’”

教育孩子需要耐心，需要理智、需要牺牲。这本书还有很多生动的例子：譬如尤拉——作者的孩子，曾经闹事惊动警察署，作者并不急于指责，只是在他感到羞愧的时候，才加以开导。从这里指示了我们：教育孩子所具有的波折和痛苦。有一次，尤拉对一些颓废诗感到了兴趣，妈妈设法找到了该作者的其他作品给他阅读，并且请了一位文学家朋友来和他讨论，终于尤拉自觉的抛弃了这些叶赛宁的作品；从这件事，我们看到了教育方法的多样化与伸缩性。一时的冲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母亲手记》在书店里可以找到，也许还有其他优秀的作品，值得为人父母的去阅读。

前些时候，有一篇本地作者写的散文，叙说健全的下

一代所应有的反应。我也希望，我们的画家，有朝一日，能够替我们的孩子们，画了这么一幅速写：

一个孩子微笑的伸出一只手，让护士阿姨给他打针；另外一些孩子排着队，伸出头蛮有兴趣的望着。……

多么美好的下一代！

×

×

×

上面这一篇文章是在七年前发表的。现在，自己也有了孩子，再重读这一本书，味道更加浓淳，有点字字是珠玑之感。

这是一部充满战斗思想的作品，这是我以前没有的观感。作品中写的虽然是许多琐碎的事件，然而就在这些平凡的描述中，我们了解了一个革命家庭的故事；也从这些琐碎的事件里，作者父母的乐观战斗精神，以及作者的大无畏气概，深深鼓舞着他们的孩子们，还有我们，一齐前进。

看，作者怎样把自己和大众的命运联系起来：

“为了把我们，母亲们，从那种对明天的可怕犹疑中解救出来，需要经过何等的风暴啊！为了确立母亲对明天的信心，我们全国的人需要花费多少的天才努力，需得忍受何等的牺牲啊！”

谦虚的母亲，有理想的母亲，才说得这样的话：

“我希望看见自己的儿子在精神上是雄伟的，在道路上是光辉的，因此，我自己应当更加完善起来。”

正是在明确了对孩子的期望，与对正义事业的支持，是利害一致的关系后，母亲的悉心教导，呕心沥血，才有崇高的价值。尤拉为了击退德国侵略者，在炮火中捐出了性命，母亲是悲痛的，然而母亲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

“儿子光荣地经历了自己的道路。我是他的母亲，我曾为这条路而教育了他，他也走完了这条道路。他完成了自己国家的、我的（他的母亲）号召。为什么悲哀失望会控制着我呢？……坠入在悲哀失望中，这就意味着离开了理想的旗帜。”

全书感动人的故事很多，发人深思的句子也很多。结合起我们现在的下一代的遭遇来看，已经战战兢兢的我，尤其对作者转述其父亲临死时的谈话，感到惊心动魄：

“父亲坐在邻人们的中间，他说到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儿女，也说到他所以能够勇敢地、率直地正视自己的儿女，是因为把他们引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去。”



1977年重改

读《马来亚古今谈》

用华文写就的马来亚历史书，似乎以余寿浩著的《马来亚古今谈》为第一本。这本书原来是在1952年连载于《南方晚报》的副刊上的，翌年才印成单行本。

当时，马来亚华人正在掀起争取公民权的运动，然而英国殖民政府以及马来统治阶层却以各种不成文的理由加以拒绝。根据许云樵为本书所写的序文说，马来亚的华人多对以往的史实不明，因此华人想展开据理力争的运动，理又从何来呢？所以，他认为本书正是应时之作。我读完了本书，却不觉得它能构成一个有力的结论，主要的原因是作者应用了落后的史观来分析史实的缘故。倒是许云樵在序中的几段话，雄辩有力，替民众说了几句公道话。

作者尤其在近代史方面作了很错误的评述，对于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势力，不仅没有微言，还显露了感激之意。就以全书所作的重要结论来看：

“于是华人们，钦慕当地政治的清明，谋生的容易，纷纷南渡，……结果，……在英人的政治，华人的血汗，巫人的地力，三种力量亲密合作之下，数十年间，便进入极度繁荣的景象。”

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应该加以驳斥的。实际上，就以本书史实的叙述来看，作者是自打咀吧的。

英国最早在马来亚的权益是由英国驻在印度的东印度公司处理，当时由于着眼处只在马来亚锡矿的获得，因此

对于这个经济价值尚小的半岛，并不急于加以全面侵略。后来槟榔屿、新加坡在几个具有个人野心的英殖民部官员的经营下发展起来，半岛的利益明朗化了，因此英国政府就任命了克拉克爵士（Sir Andrew Clarke）为海峡殖民地总督，利用了武力和欺骗的手段，逐渐占有了马来半岛的各种实际利益。所以英人的政治，绝对不是什么恩赐，而是利益当头的打算。

作者在另外一篇文章《马来联邦的组织》里，对这个问题倒作了一些交代：

“英人政策所以变成积极，约有下列数因：（一）这时正是欧洲列强对于世界落后地区大事兼并的时期；（二）暹罗对于马来亚北部已造成威胁；（三）马来亚西海岸各邦内战频仍；（四）马来亚内地矿产丰富。”

作者能够补充了上述的分析，对于这个海盗国家的真面目的揭露是有帮助的。可惜的是，作者却把表面的繁荣，如道路的开辟以方便输送矿产，当成是英人政治清明的表现。实际上，殖民地政府的掠夺政策，正是造成广大民众贫穷的主因。

让我们再看看华人纷纷南渡的真相吧。荷兰东印度公司第一任总督巴德申·卡因（Paterson Caen）给其继任者的信中说：

“……遣战舰往中国口岸，尽量掠捕其男女幼童以归。……特须注意多捕华人，妇孺更佳。……”

经营“猪仔”贸易的，还包括了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的移民公司。后来清政府允许外国在中国收罗“猪仔”，用的也是威逼和欺骗的手法，成千上万的“猪仔”被榨尽了血汗后，就只有屈死外乡了。以上所说的也都取材于本

书，因此作者又为什么能忍心得到这么一个结论：“华人们钦慕当地政治的清明，谋生的容易，纷纷南渡”呢？

由于作者历史观的偏狭，因此对史实的取舍就有了偏见，到了有所评述时，更免不了错误了。譬如作者对于英国在日本发动侵略马来亚时的投降行动，倒想了好些替他们洗罪的藉口，如：“英守军海空军都很脆弱”，“英方虽曾作种种准备，但不能制敌机先，仓卒作战”、“英军擅长阵地战和机械战，而日军擅长游击战和森林战”，因此英军事首脑，认为继续抵抗，已属无用。到底英国殖民地政府对马来亚的沦陷应负什么责任呢？下面的事实倒是值得注意的：

（一）英印澳军共有十万人以上，而攻打马来亚的日军只有三万多人。日军是以一抵三，在两个月内攻克半岛的。

（二）英国殖民地政府一直等到1942年1月才释放抗日份子，并且临时只发给少数陈旧的军械于抗日军；而在1941年12月8日，日军就已攻入吉兰丹。

实际上，英国政府对轴心国早就发动的侵略战争，一路来都采取纵容的政策，因此日军才得以发动1941年的太平洋战争，正是自食其果。

（三）在两个月的防御战里，英军节节败退，从来不想留在敌人后方，如躲入森林继续作战；结果星岛失陷时，英军被俘虏达八万人。

所以，本书对于英国政府造成马来半岛的沦陷的责任，只是轻轻一带，是有失史家公允的。不但如此，作者对于沦陷时期的抗日活动，也不能作客观的报导，而只突出了实际上发挥很小作用的盟军特派员林谋盛烈士的作

用。因为根据其他方面的资料，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主要活动与林烈士的领导是拉不上关系的，而人民抗日军在三年八个月的黑暗时期，流汗流血为了光复马来亚却不知作出了多少贡献。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先后成立的八支独立队的作战成绩，实是功不可没。到今天为止还为人民所传扬，但是本书却只字不提。

作者在结尾时对新中国的态度，蛮横无理，完全没有摆事实讲道理，只有满纸谴责之词，这更不是史家所应有的态度了。

作为一本历史书，还应该包括了对各时代的经济生活的特征、典章制度和文化艺术的介绍。也许整理马来亚史料遇到的困难很多，然而这毕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缺陷。

这本书除了史观的基本错误外，也存在一些写作上的缺点。首先是资料的零碎，全书分五十二篇，篇幅则只有两百一十三面，象许多重要的篇章，只用了一千五百个字就作了交代，可以说是太过简化了。

编排方面虽然基本上是按年代叙写，可是又因为各篇自成一章，史实的衔接就不紧凑了。本书的文字仍嫌不够通俗，颇有文言白话参半的感觉。

×

×

×

说了这么多本书的缺点，我仍认为只要我们带着谨慎和批判的态度来阅读它，在今天马来亚史缺乏整理的情况下，仍然是值得用心阅读的，以笔者来说，就仍旧感到受益不浅。

本书介绍了马来亚新石器时代遗留的一些石器之外，也从中国史书上的明文记载，介绍了中国与马来半岛的历史关系。也许一路来三宝公与马六甲王朝的关系被渲染过

分，因此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这便是中国与马来亚的来往的开始了。事实上，最少距离现在一千五百年前，中国南北朝时，处于现在吉打 Kubok Balei 的狼牙修国便曾去中国进贡。接下来的交往，可能就是隋炀帝时，派使臣到过现在位于吉兰丹与暹罗南部宋卡的赤土国。唐代时，交通发达，两地的交往就更频繁了。宋时也有现在位于雪兰莪的 Bernanang 国的记载。到了元代，《岛夷志略》一书就有关于现在的彭亨、丁加奴和星加坡的记载了。

马来亚的三种土著也在本书得到了介绍。他们是 Semangs、Sakais 和 Jakuns。至于马来人一直到十二世纪时，才从苏门答腊等地移殖过来。所以，马来亚最早的民族应该是我们称为矮黑种的西蒙人 (Semangs)。根据本书介绍，西蒙人还处于原始公社的社会制度里，他们多住在马来亚北部的海滨沼泽区。

本书也介绍了好些民间传说，他们不但饶有趣味，同时也是富有流传价值的。象记载在《马来纪年》(成于1612年)里的一个故事，说的是印度的一个国王，在举兵讨伐中国的路上来到了单马锡，遇到了一艘从中国来的船。印度国王便问起路程有多远，船上的人答道：“当我们扬帆出发的时候，我们都不过二十岁左右，我们把这些树的种子种下，现在，我们都已老了，牙齿也落掉了，种子也都变成大树了。”实际上，这船上的人是中国国王派来欺骗印度人的，但是印度国王信以为真，便打消原意了。这样的故事虽是天真可笑，可是也说明了当中印两国已经处在文明时代时，马来亚还是荒凉岑寂的。

在马来传说中有过两次中马通婚的故事，在中国的史
10 书上虽无记载，但是从这些传说中，也可以反映了中马两

国人民和睦共处的美好愿望。其中一个故事，前两三年还被写成歌剧，表演在吉隆坡的舞台上。故事讲的是中国公主汉丽宝下嫁马六甲苏丹芒速沙的情形。据说马六甲的 **Den - China**（中国区）就是那时候苏丹指定给中国随员居住的地方。

这本书也附录了很多相片和图片，有些是颇珍贵的，如“在吡叻拾到的粗陋石器”、“在新加坡皇家山发现的马迦马希遗物”等。

×

×

×

《马来亚古今谈》，作为第一本用中文写成的史书，虽然存在严重的历史观方面的错误，但是作者的辛勤收集资料和编写，也表现了一些成绩，值得重视。希望大家做为这块土地的主人，既使无意从事编写历史的工作，也应该提起兴趣，认真对待有关这方面的学习。

充满希望的世界

曾经听到某位朋友表示对中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因为他的亲戚从中国回来，反映了很多令人痛心的事。那位亲戚告诉他，那里的人们吃得很不好，猪肉猪油都是稀物，白米有时还要渗着杂粮吃；那里的人们穿得更不够，他带去的衣服，他们一拿去就穿在身上；另外，更有一些令人失望的事，说明社会主义道德在那里，最少是不很普遍的：譬如有一个干部，他的孩子生病了，除了求医外，还偷偷跑去土地庙烧香；他在广州时，就看见有人喊荷包被偷去了；村里的卫生设备也太简陋了，大便桶就藏在睡房里。还有……

我一点也不怀疑他的亲戚所反映的是事实，但是这些事实能够说明什么道理呢？能够说明新中国的政权和人民的关系是对立的吗？或者只是说明新中国并不完美，还有很多亟待纠正，亟待改善的地方呢？如果是后一种看法，我是赞成的。但是，我们仅仅有这样的看法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确定成立了二十五年的新中国，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增强了中国国势，也改善人民的生活。不但如此，这种变化也必定继续发生得更激烈、更彻底。中国人民的创造力量，对于全世界人民，尤其在即将来临的二十一世纪里，必然是一件大好事——“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中国人民不但说了出来，也做了出来：他们正在做，也会继续做得更多、更好。

我们怎样才能从那些“令人痛心的事实”里，得到上述的看法呢？我不愿意详细去分析这些琐碎的，个别的，当然有时具有某些本质意义的现象。我觉得让我们详细阅读汉素音所著的《2001年的中国》将能帮忙我们全面去认识今日的新中国。我们将不会再让一些表面的报导所模糊，我们也必将能认识清楚，新中国已经是一个不断壮大的国家，新中国的道路正是全世界人民应该走的道路。

作者开始就《从中国的历史看将来》，为我们扼要的复习中国近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她也应用了正确的历史观，分析了屡次的农民起义，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的伟大作用，不仅如此，她还着重的结合了亚非拉各国人民的现状，比较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的情形，然后在《井冈山道路》这一章中，坦言说：“在中国发生过的事情，一样能够在世界其他各国的农村地区发生——这是人们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世界革命的典型的基本出发点。”

作者分析了中国革命成功的原因，首先是有一个坚强的革命政党，和一个善于结合先进理论与具体情况而制定正确的斗争政策的领导层，因此经过了无数次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有的遭受挫折，有的赢得局部的胜利——绩累了无数的经验，因而建立了一种当代最高的革命理论。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中国革命力量终于能够击垮了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的大联合攻势，而取得彻底的胜利。

这种最先进的革命理论，认为在今天的未开发的国家中，首先产生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是行不通的，因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强大垄断资本势力，是决不容许在这些地区产生能够与它争夺资源和市场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对于各国

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不是镇压就是收买，或者两种方法都采用。总之，未开发的国家要争取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通过和平过渡手段是行不通的，只有发动人民战争，用乡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才能成功。作者还进一步指出：“从世界革命的角度来说，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印度，就是世界的“农村”，……目前这些“世界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可以象中国革命那样做，从而最后赢得世界规模的胜利。”

新中国是在1949年成立了，然而新中国的革命运动并没有寿终正寝；相反的，正以规模更大，内容更深入的姿态不断发展。从1949年开展的第一个全国规模的学习运动，一直到几年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本书出版于1967年），我们认识到在中国不断开展的各种运动，都具有深长的意义，都是在这个战线或者那个战线上，反对旧社会留下来的各种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遗毒；后来苏联修正主义崛起，中国也反对起国外和国内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政治挂帅的中国》一章中，我们能够对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年的各种群众运动有一个概括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于这些一脉相承的政治运动，将学会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中国的这些运动，都是为了确保江山不变色，都是长期艰苦的人的思想改造工作的一部份。前面提过的在新中国发生的迷信、偷盗的例子，绝不会只有一宗，然而这正说明，中国领导层展开的一次又一次，一场又一场的思想改造的运动，正是他们按步就班，实事求是，又是富有先见的领导的表现。因为这些运动正是针对旧思想开刀的，因此听到了、或者看到了某些人的落后表现，绝不应该感到诧异，相反的，我们应具有无限的信心，因为他

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一定能够被改造成一个新人。

中国除了进行精神改造外，也一样进行物质改造。改造大地的斗争，正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发展着，我们看到在穷乡僻壤上建起了各种小型工厂、农村作业场以及大小规模的水利建设；在城市里，工厂更是如雨后春笋的建立起来；各种公共设施，各种休憩娱乐场所，更在全国各地普遍设立。

本书也能指出中国的行政缺点，譬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盲目学习外国经验，先发展重工业的计划是不实际的，因此总结了经验，纠正了偏差后，才实行以农业为基础，朝工业化进军的经济建设的路线。作者也不忌讳的指出中国在苏联单方面撕毁许多建设的合约之后，所造成的几年的经济困境。

作者对人民公社的分析是卓越的。从人民公社开始成立的困难时期到公社的全国化的建立，她说明这是中国人民迈开大步，进入21世纪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准备阶段。作者也另外花了一些篇幅分析中国的教育情况，中国的科学成就。尤其卓越的是作者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作了客观的衡量：中国政府自然有它的坚定的、彻底的、乾净的外交政策，然而中国的许多外交政策是外国强加给它的，是帝国主义所发动的孤立中国、包围中国、侵犯中国的政策的结果，因此唯有了解中国的外交活动原则，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才能正确地判断中国的外交政策。

中国各方面的经济建设的进展是惊人的，然而单单从数目字来作判断，是不足以衡量它的伟大的。中国经济建

设所取得的成就之所以是举世无匹，不是因为经济增长率的巨大，而是从中国的自力更生，从一个一穷二白的破落户所取得的进展来衡量。大庆和大寨的故事就是最生动的例子。我们也只能从这样的事实中，才能深切的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劳动人民所付出的努力，正以史无前例的成就得到了补偿。广大的中国人民生活得到了全面的改善，这些不能单纯从收入的多寡来判断，而应该从解放前后，广大劳苦人民的生活来作比较。而且正是这种自力更生，然而又是互助支援的精神，反映了个别地区、个别县分、或者个别村落的生活水平的一些差异，然而这些差异将能通过长期的努力，以生产力的全面提高，来得到弥补。因此，不能孤立的以这儿的物质享受水平来衡量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那是不实际而且是片面的。

只有从长远的、全面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幅员九百万方公里，人口七亿的国家的进展，才能对这个国家的进展作出正确的评价。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无论从人的思想，道德表现，到物质的生产，建设的成绩，都可以得到证明。而且正是那种放眼世界的远大目标，使得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也同时裨益了世界劳动人民。

汉素音对中国的革命和现代革命理论的理解是深刻的，这应该是认真和虚心学习的结果。我们从作者的关心革命，关心世界劳苦人民的利益的文字中，不但认识了许多道理和事实，也被作者的真诚感动。这也许是我阅读过她早期的一些著作，以及对她的生平有些知悉的缘故；然而无论如何，许多人也会和我一样，对于这一位世界知名的作家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改变感到高兴，感到鼓舞，这也许就是真理之所以成为真理的最好说明吧！

读完了全书，我对作者把本书题为《2001年的中国》感到非常赞赏，因为作者并没有擅自作浮夸的预言，然而却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从旧中国的破落到新中国的新生，作了有条有理的叙述。这些叙述帮忙我们廓开了眼界，扫清了烟幕，展望到三四十年后的中国——让我们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了现实性的信心，让我们从心眼里对新制度怀着十足的热诚和希望。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必然是一个更加强盛、更加壮大的中国；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必然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



30·5·74

介绍几部日本小说

提到日本小说，也许有人会想到川端康成或者那个直接宣扬军国主义思想的小岛由纪夫。他们的小说，我各看过一部，都觉得很枯燥，内容完全不可取。如果有人因为读过《雪乡》而误会日本小说都是这个样子，那真是令人惋惜的一场误会。

这两三年来，市面上可以看到几部日本小说，都是文学佳作，有的更属文学作品中的上乘。

我最欣赏《木偶净琉璃》的心理描写部分，尤其是第四章。然而它最好的地方，还在作者对语言的掌握：简单、朴素、又生动。这个中篇小说的民族色彩浓厚，乡土风味十足，令人读了觉得既不熟悉又颇亲切。我想：我感到不熟悉，是因为我对日本民族的生活状况和风土人情感到陌生；我感到亲切，是因为凡是真诚的描写人民生活的作品，必然会感动人。

《木偶净琉璃》写的是一些日本艺人到外县献艺的故事。他们听取了工人群众的意见，促进了新一辈演员的成长。故事中暴露了日本社会的丑恶面，也赞美了互相帮忙的年青艺员的优良品质。但是小说中反映的新剧种的创立，却介绍得不清楚，也存在一些错误。到底这本小说的写作动机是什么，颇不明确。由于作者有吉佐和子的思想存在一些资产阶级的毒素，因此本书反映的题材虽然很新鲜，写得也还深入，其教育意义却还存在了好些不足的地

方。

有吉佐和子这个日本当代的女作家，写了好多作品，早年是毕业于东京女子大学英语系的。她的思想的主要部份是资产阶级的，因此反映在她的道德观里，仍旧是浓厚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在另一部小说《黑衣》中，他写了一个前台工作人员的遭遇。这个黑衣好不容易的得到扮演一个小角色的机会，虽然病了，却仍旧抱病演出。后来终于在剧团赴外县演出获得成功时病逝。

故事写得委婉动人，人物刻划得栩栩如生，我们不禁为“黑衣”满怀同情，也从心底去喜爱这个受压迫受侮辱的下层人物。然而象黑衣这样的辛酸，是谁造成的呢？作者虽然也描写了老板和老板娘，可是描写得很不足，更不能真实的、大胆的暴露他们的可恶。因此“黑衣”的死，似乎只是一个自然发生的悲剧。故事中隐约出现的反面人物，到最后也消声匿迹了。这应该是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局限所造成的结果。因为作者虽然同情下层人民，看到他们善良、勤劳的本质，看到他们的不幸，可是却不能看穿繁荣社会的本质，不能认清制造灾难和不幸的祸首，更认识不到社会运动的主流和劳动人民联合起来的力量。因此在他的笔下、没有人为的灾难，而灾难是不可避免的；劳动人民是贫困无助的，是软弱的。

可是我仍旧推荐这两篇小说，因为它们仍旧反映了血淋淋的现实，让我们呼吸到日本泥土的芳香，拉近了我们和日本劳动人民的距离。

×

×

×

和有吉佐和子的作品比较，壶井荣的《二十四颗眼珠》高了一筹。

二十四颗眼珠代表了十二个小学生。他们在大石老师的谆谆善诱下成长了，然而日本军国主义者却把那些男的抓去当炮灰，那些女的也因为无法生活，不但出卖劳力，还出卖肉体。

在阅读的过程，作者的女性化的细腻描写方法，有力的勾动了我们的心弦。我们看着那群活泼、朴素、热情、坦白的乡村小孩，在课堂里怎样生活，在课堂外又怎样生活；在学校里如何学习，在家里又如何工作；和老师怎样相处，和同学又怎样相处的情形。他们的活生生的形象，让我们从心底去爱护他们。我多么希望，这部小说不要这么快让他们离开学校，不要这么快让他们长大，因为我真不忍心去阅读后面的那几章——一个恶魔突然出现，把那美丽的二十四颗眼珠的生活捣乱了，他们后来都沾上了肮脏和丑恶。这魔鬼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

回忆起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残暴，它不但给被侵略的人民带来浩劫，还给本国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害。作者写这本书是在1952年，当时日本自卫队正在酝酿产生，以首相吉田茂为首的反动政府，正面对着日本社会党和共产党发动的反对建军运动的怒潮。作者也举起了文艺大纛，参加了这场日本战后第一次展开的反法西斯运动。作者充满了对劳动人民的真情，描绘他们的可爱，也道出他们的不幸；更满怀对军国主义的仇恨，咒骂了那个造成灾难的祸首。

然而作者作为一个进步的日本作家，她的小说还有不足的地方。在她笔下的大石老师，随着岁月磨人，壮志也消沉了，因此全书的结尾是郁闷的、消沉的、缺乏斗志的。同时，作者对军国主义者的狠毒，还只是旁敲侧击，

不能击中要害；作者的热情是饱满的，然而只是汨汨而出，不够奔放；全书的基调因而陷入一种稍嫌低沉的抒情气氛中。

读完这本书，我们会和大石老师一样喜欢日本的下一代。可是最近我们听到日本学生，又被教导了军国主义的辉煌史，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在历史上所犯的不可补偿的罪过却只字不提。我们不禁要为那些一双双的、美丽的眼珠着急：大石老师啊，你要振作起来，让我们的下一代认识清楚，不能再受欺骗了——要他们握紧小拳头，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呀！

×

×

×

小林多喜二，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他不但是世界著名的文学家，还是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心目中的一个学习偶像——为了革命而牺牲的烈士。

小林多喜二，本来是一个银行的小职员，可是苦难的出身，百孔千疮的社会，以及十月革命的影响，促使他一方面努力从事理论学习，另一方面积极的投入群众斗争的洪流里。他参加革命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年，可是一往直前的小林多喜二，却发挥了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勇于发掘当时发生的最尖锐的斗争生活的题材，写下了许多光辉的作品：象《1928年3月15日》以及本文所要介绍的《蟹工船》和《沼尾村》等小说都是。

《蟹工船》被誉为日本现代文坛的里程碑，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这是第一部成功的应用了革命世界观写成的描绘劳动人民斗争的文学作品。1929年正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时期，日本的农村破产，工厂倒闭，学校缺乏资金停办，大量的劳动力涌入了失业的浪潮，人民的生活苦

不堪言。当然就有投机倒把的资本家出现了，他们抓紧这个机会威迫和欺骗，把那些失业的农民、工人和学生，都赶到一只只行将废弃的旧船上，然后把他们送到冰冷的堪察加海上，搜捕螃蟹，制成罐头。

堪察加海的酷冷吓不倒渔民，船上非人的遭遇和刻薄的工作条件，却把许多健壮的躯体折磨成只留一口气的病人，当然也有许多病死了被丢进海里。作者抓住了阶级矛盾的主线，把亲身体验的蟹工生活，经过集中和提炼，写成了一部感人肺腑的蟹工生活图。这幅图画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充满了动作的。焕发着热情的蟹工们反抗了，他们把监工们制服了；可是他们心目中的保护者——天皇派来的驱逐舰，却把领导人抓走，并摧毁了他们斗争的果实。然而苦大仇深的蟹工们，吸取了斗争经验后，又在准备着展开另一场斗争了。故事虽然没有再写下去，可是洋溢着战斗气息的蟹工们的精神，却继续感染着读者的情绪。

作者的写作技巧是第一流的。就看他对海上航行的描绘，便惊慕于作者的观察深刻和运用文字能力的高超了。作者描写了很多人物，然而用字是那么简洁，真象是一幅幅善于捕抓人物精神面貌的速写。作者的进步思想始终贯串在整部作品中，无论对蟹工、监工、船长或者日本军官以及可敬的俄国人民，作者都严谨要求自己，分析精密，爱憎分明。

然而与其说《蟹工船》是一部中篇小说，不如把它当成一篇精彩的报告文学。因为我觉得作品中有提出姓名的几个人物，只是作者在忠实的反映蟹工生活的同时，勾划出的几个轮廓。把“结巴”和“学生”等，称为小说中的

人物塑造，是不适宜的。然而把它称呼为报告文学，并不会贬低它的文学地位。相反的，正是作者应用了这样一种文学体裁，让读者尤其是广大的日本读者，更容易感同身受，为那些血淋淋的压迫唤起阶级意识，把那些勇于反抗的蟹工当成学习的对象。

×

×

×

可惜只看到《沼尾村》的第一部，因此在小说中埋下的许多火药线都还没有点燃，一部充满了战斗画面的小说，没有了下文，这真是一件憾事。然而就只看了这一部，作者所塑造的正面人物，就已令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小林多喜二用字的巧妙和传神，在《沼尾村》里又再一次的成为我们学习的模范。

《沼尾村》的写作年代，是1932年，日本发动918事变后的一年。这时日本军国主义者，已经在国内加紧实施军国主义政策，严厉扫荡进步的反侵略力量。然而在日本共产党等进步组织的领导下，在小林多喜二等共产党员的指挥下，日本的城市和乡村人民却通过各种形式，展开宣传教育和动员组织的工作。《沼尾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沼尾村》真实的反映了当时日本国内的动乱状况，也热情的歌颂了革命志士的战斗气概。相信如果有机会阅读全书，我们将能从中吸取更大的战斗力量。

×

×

×

小林多喜二在1933年就义，死时只有29岁。然而作者遗留给我们的文学遗产和一生的战斗事迹，却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进。鲁迅在给烈士的唁电中这么说：

“日本和中国人民是弟兄，资产阶级用血在我们之间划了界线，而且现在还划着。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驱 2

者，却用血来洗去这种界线。小林多喜二的死，就是最好的证据。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忘记，我们将坚决地踏着小林同志的血路，携手前进！”

是的，日本侵略者也曾用我们的鲜血划了界线，然而广大的日本劳动人民还是我们的亲兄弟。

让我们从阅读各民族的宝贵文学作品中，促进了解，加强我们的战斗友谊。

30·7·74



《不落的花朵》读后感

物价高涨，生活费用拮据起来，最近买书也不免经常犹豫了好一阵。但是对于金依的小说，我几乎是饥不择食的。象《还我青春》、《大路上》、《小琴妹妹》、《原子尘》以及《迎风曲》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迎风曲》，算得上是一部水准高的小说吧？可是最近读了《不落的花朵》，却不免有点怅然。我的隐忧又再出现：因为私下以为一个作者如果太过多产，总是会有一些滥竽充数的作品出现。《不落的花朵》虽然还不致于有时下一些职业文人赶时间交稿所犯到的毛病，然而也可以看出作者写这本中篇小说的匆促与不够认真的地方。

《不落的花朵》有一半的内容是通过书信的来往交代事件的发展，显得不够用心经营，有些沉闷。作者处理情节，也有些避重就轻，象最早木玫是怎样争取何桂海，改变一些恶习惯坏作风的呢？在最重要的关键时，作者反而一字不提，似乎这样的写法是顺理成章，我却很不以为然。作者在故事将结束时，我们都睁开眼要看木玫怎样同何桂海把问题谈清楚，半路却杀出一个花王来的故事。也许作者感到故事越来越乏味，想再加点“料”，可是花王来的故事，事先并没有埋伏线，与主题拉上的关系，也太勉强了。

这个小说的味道不够的地方，还出现在作者所描绘的人物形象不够鲜明，象木玫的性格与思想状况，由于描写

事件的局限，还显得很细致也不深入。做为木玫的导师的品卿姐，可以说是没有发挥的余地，她只是作者在叙述的过程中，避免太过公式化而找出的一个陪衬品，因此品卿姐是一个概念化的人物。对何桂海的描写，尤其是下半部，只限于间接的叙述，因此显得很模糊，只有在课室胡闹的那一段，着笔则很生动。金宝光几乎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作者给他出场的机会太少了。岑翠云倒是一个新鲜的形象，交代也合理，有个性，不过可惜的也只是跑龙套的份儿。由于本书所描写的冲突不集中、不尖锐，因此人物性格也无从在冲突中突出。总说一句，全书的人物除了翠云外，实在不容易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尽管如此，由于这故事的题材现实，作者处理这个题材的观点也正确，小说所揭示的意义还是积极的。我们从木玫的身上，的确嗅出了不落花朵的芬芳，我们看到大部分热爱生命的人们；正以积极向上的态度，向生活的压力挑战。

读了这本小说，也许就因为题材亲切，倒是引起不少感想。

象何桂海对木玫的“那一段情”，从小说开始到结束，还是没有彻底解决的，不过显然的，情况在改善中。我个人就有这种感受，当我们碰到朋友有这种所谓“未进爱情的门槛，就先失恋”的情形时，我们应该要有耐心，用语言来谈清问题是有必要的，可是不要以为对方就必须公开接受，相反的，对方需要经过一番折磨，然后才会逐渐好转的。如果我们一味要求对方立刻认错改过，那是缘木求鱼，欲速不达的。只要有耐心，对方又能听懂道理，假以

例子的！关心再关心，帮助再帮助，感情问题必须经过一个“过渡时期”才会圆满解决的。

至于年青人犯上处理有关这方面问题的错误，是在所不免的，不必引为自咎，只要发生问题，就去解决，那么即使感情上一时不甚愉快，也好过埋藏心底，长久影响工作与学习的情绪。

再想到何桂海的情形，一个本来是生活腐化，不求上进的青年，到最后能够得到木孜等人的帮助而逐渐走上正道，木孜的为人实在值得敬佩，而起初翠云和宝光的不理睬态度则颇令人发指。可是，我以前比起翠云和宝光，不是更加幼稚、无聊吗？！

记得念中学时，我们这些“好同学”经常是以貌取人的，那位同学衣着“飞”点，我们就刮目相看，把他们当成“坏蛋”，杯葛他们，打击他们。他们有的也因而显得更“飞”、更野蛮。可是事过境迁，出来社会混也有十年，这些被指为“飞”的青年，虽然衣着上也许还没有大改变，可是他们都还算是普通群众，有认识不足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可取之处。独是那些象我一样随便怀疑别人的“进步党”，许多却生活腐化，甚至为了个人利益而丧失立场，助纣为虐；自然还有少数能够坚持信仰，然而以往的错误，不已正阻挠了事业的发展速度吗？想想怎么不令人后悔过去的鲁莽与短见呢！可惜事过境迁，只能在记起那些被“冤枉”的同学时，内心无限惭愧。

因此，我衷心祝福今日有志之青年，放开胸怀，千万要向木孜学习，不好疏远那些有坏习惯、坏作风的青年，而应该争取他们，团结他们，吸收他们，把他们变为我们的有生力量，这样我们才能日渐壮大，而不是自己缚起手

脚来做事，日益萎缩。

本书第101面最后第二段是这样写的：

“我是海洋里的一滴水，全世界海洋里的水，都是连结着的。也许有时它会受到污染，但是太阳的蒸晒使它们化为云雾，化为雨滴，带着灰尘重新降落到海洋里，它又跟众多的水滴融合在一起，澄明洁净，成为庞大海洋的一份子，一同在壮阔的波涛里。”

这一段话的含义并不新鲜，好多散文都有这样的描写，虽然文字略有不同。可是我最欣赏的是“带着灰尘重新降落到海洋里”。根据自然科学常识，雨水所带的杂质是巨量的，有时也包含了幅射尘；可是这里面我自忖还含有这样的深义：我们在一次净化后（蒸发上天），还会染上污点的，然而并不应该气馁，我们也应该看到带着缺点的我们，融合在集体里面以后，就有机会“澄明洁净”，在群体中进步，并且起着作用。相反的，如果我们这一滴海水，只供放到显微镜下观察，那么我们将是满身污秽，弃之不可惜的。

×

×

×

《不落的花朵》用来象征本书所歌颂的友谊之花，我并不觉得十分切题。这书与其说是赞美这批正直青年之间的伟大友谊，不如说是一本偏重说理性的探讨青年友谊、学业、工作和理想的小说。

不过我还是喜欢《不落的花朵》作为书名，因为主角

还孔子本来面目

最近，我们可以从报章、书本或杂志上，看到好多有关批判孔子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虽然重点各有不同，出版者也不同，写作者的时代背景歧异更大，然而大部份都能够从正面或者侧面，反映这项批孔运动的内容，突出这项运动的意义。读者们也能从中接受一场思想教育。对个别人来说，有时候可能还是残酷的，因为某些长年累月形成的观念，已经变得根深蒂固了，不容易一下子改变过来。

我看到的文章，除了分析孔子的生平和思想外，叙述继孔子之后儒家的发展，以及历代反对孔孟之道的思潮的都有。然而这篇随笔，只涉及批判孔子的部份。

研究孔子的思想，十年前或者更早以前和这三几年看到的书的最大不同点，我觉得仍旧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分期问题。以前，即使是中国的领导人也只这么笼统的说过：“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更何况其他的许多学者，也难免会在这个问题上发生错误。当然郭沫若在1952年已经提出现在才被公认的分期法。不过，分期的不同，不完全是两条思想路线的问题，更多时候是因为发掘到的资料不够和不能十足掌握科学方法来分析的缘故。现在，据说中国的学者已经把春秋战国之交，当成是奴隶制复没封建制兴起的时代。

郭沫若在1972年7月发表的文章：“中国古代史的 29

分期问题”，是近年看到的权威作品。作品写来通俗易懂，而又具有非常强的说服力。作者从地主阶级的成长，分析了井田制的发展，铁器的应用，以及劳动力的地位的变化，精炼的分析了封建社会的成立过程。再具体的分析了几个国家的变革情况，证明了春秋战国之交，确是中国由奴隶制转换为封建制的时期。

孔子做为没落奴隶主的一分子，企图挽狂澜于既倒，虽然犹如螳臂挡车，蚍蜉撼大树，可是也产生了阻滞历史前进的反动作用。从整十篇批判孔子为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的文章里，我把他们分析的事件，集中成下列几条：

（一）谴责鲁国季孙、孟孙和叔孙三个由奴隶主分化成新兴地主所施行的税收制，这反映在“三分公室”和“四分公室”的事件里。后来也反对季孙要实行的田赋制。这是孔子对待经济改革的态度。

（二）在政治方面，孔子更显得是一个顽固派。他一方面设法“堕三都”，反对季孙越天子之权，灭颛臾的行动，坚决维护旧的分封制；另一方面劝鲁哀公讨伐田成子，因为田成子杀了齐简公，是犯上的行动；对季孙不守周天子的奴隶制礼仪，如擅用天子专用的八佾（由六十四人组成）乐舞，拟仿诸侯的“旅于泰山”，以及不根据规章乱用器皿等，都大感愤怒，这更容易看出孔子的拘泥不化。

（三）孔子除了维护奴隶制的分封等级和世袭制度外，也反对新的刑法的产生，象晋范宣子改进了旧的法律，后来晋人又铸鼎把条文公开化，这些都引起孔子的反感。

(四)孔子杀了鲁国宣传进步思想的少正卯。这个事件最清楚的暴露了孔子伪善的脸孔，然而这件记录在许多史书的事实，却被许多别有居心的学者否认，认为是穿鉴附会之记。

因此，赵纪彬收罗了大量的资料，写成了五万字的《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严正的驳斥朱熹、梁启超、钱穆和冯友兰等人往孔子脸上贴金的谬论。本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原书写成于1969年，是在“批孔”运动开始之前。写得条理分明，非常认真。然而，全书似乎也存有某些疑点。象作者比较属意的“三月而诛说”，却无法提出根据，“但觉其确有关据”，似乎只是个人的推断而已；作者把孔子与子产同称为奴隶主贵族的维新派，也只是臆测之辞。在其他批判孔子的文章里，都没有提出这个看法。作者把奴隶社会的井田制称为“公田所有制”，这是颇不恰当的，因为井田是天子拥有、奴隶主享用的，怎么能盗用公有制的名称呢！另外，也许由于笔者对古文的认识非常有限，总觉得作者在“五恶疏证”里的训诂，相当牵强，如“记丑而博”的“丑”字竟然解释成“对立统一”。有的解释则有前后矛盾之嫌，如“心达而险”的“达”字。

杨荣国写的《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和《重新认识孔子》（原标题为：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以及由北大哲学系学员编写的《孔子是反革命复辟的祖师爷》（收集有十多篇分析孔子思想的文章），是有分量的批判孔子言行思想的文章。这些篇章，能从各方面把孔子真实的暴露在我们的眼前。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正名”，就是要大家尊守旧的名 31

分，保护旧的阶级组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这么做，绝不是什么先天而来的本能，而是当时的动乱的社会，促使孔子为了维护其阶级利益而提出的。象卫国的臣子州吁杀了卫君；楚国的世子商臣也杀了楚君顾自立为王；田成子杀齐简公；以及季孙赶跑了鲁昭公等一连串的造反事件，使得孔子对于局势的纷扰大感不妙，而不得不急忙谋应对之策。然而新兴的地主阶级并不吃孔子的一套，所以劳碌于游说各国诸侯达十四年之久的孔子，不得不暂时放弃当官的念头，回到鲁国讲学。

孔子不但看到政局的动荡，也看到新的阶级在兴起，旧的阶级在沉沦：象晋国的贵族：栾、郤等八氏的贵族都沦为奴隶了；孔子的祖父本来是宋国的贵族，现在也弄得非常落魄；另外一方面，齐国的当权者鲍文子，鲁国的婴齐以及晋国的州绰与竖头须等却由奴隶的身份挤进统治阶层里，受到新兴地主阶级的重用。孔子感到痛心自不在话下，于是他便抬起“仁”的幌子来，要求奴隶主之间要互相帮助，不好让旧贵族破落下去，更不能让奴隶爬上头来，所谓“兴灭国，继绝世”，就是“仁”的最大目的。因此，孔子的仁是虚伪的，是属于旧统治阶级的。

孔子作《春秋》，是一件大书特书的事。可是春秋是信史吗？不，孔子自己就说得明白：“为尊者讳”。这就是说，要为奴隶主忌讳。因此，孔子写的《春秋》，虽然孟子说能令“乱臣贼子”畏惧，实际上正是站在维护奴隶制的阶级立场，撰写的一部不尽不实的史书。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孔子的“为尊者讳”的虚伪性：楚叶公告诉孔子，有一个正直的人，作证其父偷邻人之羊，然而孔子却责备这个人破坏父子的名份，不懂得为自己父亲的过失

隐瞒。

孔子宣扬的孝道是：“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如果大家都执行这种守旧的思想，人类社会还会进步吗？实际上孔子的孝道，正是宗族社会的精神基础，如果大家都孝敬祖先，遵从古制，奴隶主不就可以永保天下了吗？！

孔子也讲“信”，然而当他的弟子问他为什么欺骗蒲城人时，他答说那是时势所迫，不得不如此；孔子也宣传“怨道”，可是当郑国的奴隶主大杀参加暴动的奴隶时，他却连连说好。孔子还有很多下三流的事情，都能帮助我们去认识他的真面目。

我很喜欢刘秀明写的《孔子传》。作者把孔子一生的主要活动，用通俗的语言，毫不夸张的描绘出来，孔子的可恶复可笑的咀脸也暴露无遗。真是一篇很有分量很生动的传记。

许多孔子的故事，以前也有看过，然而似乎都把它们当成好事来赞扬。这是立场的问题。尤其是编书和讲书的人，所作的注解和分析，对我们一般的莘莘学子来说，误导性更大。因此重新认识孔子，批判思想中孔子的遗毒，也就很有必要了。

以前我们即使对孔子有保留，但是称他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似乎是赞同的。大家把“有教无类”说成是孔子主张普及教育的名言。杨荣国从两方面揭露孔子的教育家的面目。首先他指出在孔子生活的环境里，一匹马加一束丝就可以换得五个奴隶，而孔子收学生的费用是十条肉脯，这叫一个奴隶怎么付得起呢？因此“教无类”吗？实际上是有阶级之分的。其次，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小人不可大受，

而可小知也”，从这些话里，我们不难知道，孔子是不会把占人口大部份的“小人”收为学生的。最穷的学生颜渊还是家里有田地和屋子的。

唐晓文却另外考据说“有教无类”原来的意思是不分氏族，按地域对奴隶进行强制军事教练，根本与文化教育无关。唐晓文的说法，是从“教”与“晦”的意义不同来立论的。我不易赞同其结论。

沙明的《孔家店及其幽灵》也写成在“批孔”运动之前（1970年11月出版）。论述孔子的部分，有分成小提纲论述，清楚扼要而又全面，值得推荐。作者在篇尾还特别提醒读者，不可孤立地看待收集在《论语》中的“警句”，如“好学”“学而不厌，晦人不倦”“学而时习之”“不耻下问”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等，而必须和他的教育目的、对象和内容等等联系起来考虑。作者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离开了孔子的政治目的，单纯谈论《论语》中有什么‘警句’，就恰恰中了他的毒计。”

以前读过的一些讨论孔子思想言行的文章，象郭沫若的《孔墨的批判》，就与现在的看法完全不同；象杨向奎的《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虽然看到孔子保守的政治信仰，却又肯定了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尤其赞美他在普及教育上的贡献。这些文章内的观点，相信已经被原作者所摒弃。然而这一个过程，必定是痛苦的。象冯友兰于1973年12月3日发表的《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作者从自己的进步过程，有板有眼的批判了旧思想的毒害，表现了作者勇于求进步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值得我们的知识分子向他学习。

杰出的《黑珍珠》

罢工不知多少天了，拉玛都拉叶没有去算，可是断炊的事情却不能不顾，一家二十多口人的肚子要她负责解决呀。

拉玛都拉叶，这个中年的塞内加尔妇女，又来到摩洛哥人开的百货商店。这间商店虽然破落狭小，可是也塞满了各种日用品。

“哈德拉梅，要知道，我欠你的账总要还清的。再说，我们的首饰也是你买下的。至少能给我两公斤米吧。”

店老板没有赊给她，不然法国资本家不许他再进货，还要关掉他的“鸡窝”。

拉玛都拉叶气愤的走掉了，在路上他遇见了当村长的弟弟：

“我不喜欢求人，尤其是求你，可是我刚从哈德拉梅家里来，他不愿意赊东西给我们，你总明白我们眼下的光景怎样，你肯替我作保，让我们买五十公斤米吗？我知道你能够办到的。”

村长推搪了一番，最后又是与洋人一鼻孔出气。要这些家庭主妇劝说他们的丈夫回去工作。可是拉玛都拉叶听得又是发腻又是发燥：

“……你跟他们串通一气，……我要你在我死了以后别来给我送葬，假使火烧了我的房子，请你想法让它烧得更旺一些，千万别朝上面泼水！”

气愤的拉玛都拉叶，看见了他那头时常闯到人家家里去糟塌东西的公羊，更是火上加油：

“至于这头畜牲，如果它走进我家里来，我就亲手宰掉它。现在，愿真主替我作证，我再也不理睬你了。”

拉玛都拉叶走回家里，还在思量着怎样分配家里剩下的一些面包皮。可是一进入了家门，看见房子里一片乱糟糟。果然又是村长的那头公羊在闯祸。

邻居们——都是些妇女和小孩，围拢起来紧张的看着拉玛都拉叶正在和那头公羊决斗。她终于和另外两个妇女把那头羊杀死了。

火在烧着，羊肉汤发出阵阵的香味。全村的人都很高兴，他们可以得到一些东西来充饥。同时，他们还准备送些给在矿上坚持罢工的亲人。

忽然间大队警察冲了进来，他们要抓偷走公羊的人。拉玛都拉叶出奇的镇定，人们虽然想掩护她，她却排开了众人：

“告诉他（指警官），今晚我们要拿这羊当晚饭！”

喧哗的女人们却在暗暗自问：拉玛都拉叶是从那儿来的这股子新劲头。看她对耀武扬威的白人警官瞪了瞪：

“我，我半个洋人也不认！他们都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就是有好的，也在落地的时候死掉了。”

街上已经来了宪兵和军队，然而一双双又圆又亮的大眼睛却闪烁着炙人的怒火。这些村里的女人们知道，平素和蔼淳朴的拉玛都拉叶是为了大家的肚子才杀死公羊的。

一刹那间，警察们被包围了。一只只瓶子，一根根捣杆，一个个熨衣服的烙铁，还有那儿捡来的木块木片纷纷

混乱了好一会，好多人受了伤。警察不得不撤退了。

然而这只是第一回合。第二天混乱带到了警察局门前。警察局里，拉玛都拉叶和一个懂法语的姑娘被带到局里，他们要控告拉玛都拉叶阻止执行法律，煽动妇女们起来反抗。她却不讲话，站在屋子的中间一动也不动。

外面的妇女群众包围了警察署，水象利箭一样直冲向汹涌的人群。

可恶的鬼子！我们失火就没有水，罢工期间连水也禁制，现在冲着大家来，就有那么大量的水！

水，把前面的群众，冲到沟渠里躲避，水把呼蒂亚·姆巴叶给冲倒了。

一时，人们静了下来，因为姆巴叶死了。可是刚把尸体放在一部车上，消防队员就得逃跑了。愤怒的妇女们推倒了两部水车，又涌向持枪的民警和宪兵。

来了村长又来了教长。虔诚的信徒们忽然不知所措。然而神话终究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鬼话连篇！杀死这个妇人的不是我们！”

杀死姆巴叶的也不是塞内加尔的消防人员，是坐在警察局里威逼拉玛都拉叶的白人警官，是远在高雷岛避暑的花生园丘的老板，是在法国本土度假的磷酸盐矿的矿主。

在警察局里，教主自诩权威要把拉玛都拉叶来说服，可是拉玛都拉叶一样不理睬，最后她扶起了被自己捆伤的年轻姑娘：

“我宁愿瞎了眼睛，活活烧死在大火里面，刮成千刀万块，也不愿意答理这个猪箩。……这些人算不上什么亲戚，也不够朋友，他们为了挣得几枚勋章，不得不去舐洋人的屁股。……咱们走了，我，我看够了他们的臭脸！” 3

没有一个来得及想到阻止，拉玛都拉叶已经拉着年轻姑娘的胳膊，走了出去。外面汹涌的人群更加汹涌。

×

×

×

这是西非塞内加尔作家桑贝内·乌斯曼的短篇小说《黑珍珠》的梗概。这个小说主题正确，描写细腻，题材更具有非常的意义。由非洲人来描写非洲人民的斗争已经够突出了，而这故事的英雄人物竟是一批“缺少教养”的黑人妇女。拉玛都拉叶虽然是小说中的人物，然而我们相信她也是生活中的人物。拉玛都拉叶的形象让我们看到了觉醒起来的非洲妇女的英勇和智慧，正是这样的越来越多的拉玛都拉叶出现在非洲的国土上，使我们看到了今日非洲民族国家的成长和壮大。这也说明了非洲妇女的作用，不但表现在辛勤的劳动，还反映在积极参与解放运动的事业里。不论是莫桑比克、安哥拉、津巴布韦、阿札尼亚或者纳米比亚的解放阵线里，英雄的非洲妇女，都活跃在高原、森林、沼泽或者沙漠里，她们和男性同胞一样，为了争取祖国的自由和独立，披星戴月，流汗流血，创下了解放民族的丰功伟绩。

再一次读完《黑珍珠》，除了赞赏作品的成就外，更对书中的主人翁感到深深的敬佩。我记起了生活在周遭的许多杰出的妇女，她们为了伸张正义、宣扬真理，不畏强权，敢于斗争。她们不就是我们的拉玛都拉叶吗？

5·3·75

我读《开埠前的新加坡》

在书店看到了《开埠前的新加坡》，感到很有兴趣，可是这一本160面的书，订价星币4元，却使我踌躇不前了。再翻翻作序的人和封底作者的像片，又起了一种反感，我甚至怀疑本书也是沽名钓誉之作。可是在本地历史著作缺乏的今天，我终于在它出版后的一年买了下来。

读完了这本书，我的观感有了不同，我庆幸自己不为某些浮夸的作风而形成太深的成见，我觉得我有必要向朋友们推荐这本书。我斗胆的这么说，这本书所写的1879年前新加坡的史料，在目前是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的。

这本书分六章来写。第一章的《导言》和书末的《后记》互相呼应，都把本书的内容作了适当的概括。《导言》比《后记》来得详细些，然而就显得琐碎。《导言》显然是本书后来各章的大纲，内容的重复自然不能避免，然而如能象《后记》般的扼要精炼，则有较好的效果。可惜《导言》不但不能饶有趣味的提起读者阅读的兴趣，某些不重要材料的铺陈，更令人有拥挤的感觉。象第11面的新加坡王朝的官职表在第129面时又出现。其他章也有这种缺点：如第70面巨石文化的注解重复在第63面的正文里。又如在《单马锡时代的探讨》这一节里，作者引述了一大段汪大渊的著作《岛夷志略》里的“龙牙门”条，然后又再下一章的第三节《元代对新加坡的交往频繁》里，以及第一章的第四节里，把同样的内容列成要点叙述，同

时在第二章又有提及。象这样的不断复述，是很不必要的，最少也会减低阅读的兴致。

然而，《后记》却是作者才华与努力的表现。写在《后记》的九个短则，正好替读者们提供了一个总结。作者文笔简炼，说理谦和，时常不忘提醒大家本书有许多可疑和等待来日也许才能证实的资料。作者在《导言》与《后记》的这一段话，是很重要的：

“对开埠前的新加坡，由于史料的贫乏，我们所能了解的非常少，许多充满着矛盾和不能自圆其说的现象令人疑惑，这一段早期的历史要从空洞的间架发展到堂皇的建筑，却还需要史家们极大的努力！”

从第一章开始加上的图片附页，有很多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难得的。这里把其中几幅作简单的介绍：

有一幅十四世纪时由法国人所描绘的东南亚地图，是二世纪时希腊人佗利弥氏所绘的想象中的东南亚地图的法译本。虽然与现代的地图一比较是不可辩认的，然而即使是这样不可辩认的地图，也不完全是想象的结果，古代希腊人民的航海事业的劳绩，应该要记上一功的。

我国石器时代的遗物如蛤壳的化石和手斧，外来的青铜文化的西汉铜钟，以及巨石文化时期的“活石”的相片，都是很有历史价值的资料。我们只要想象发掘这些遗物的困难，就会对这些古代人类智慧的结晶品产生敬意。

吕宋岛上长有尾巴的人（菲律宾高山省 Samti 村的 Bontok 人），也是一张很少机会看得到的相片。如果我们对“他”的兴趣只是止于“好玩”，那是对我们自己的侮辱。如果能从动物的进化观，再结合科学的历史观来看，虽然书本没有提供任何资料，我们仍会对“他”产生

了一系列的疑问：这是个别的遗传反祖现象？还是人类种族的特殊一支？

有一张宋代的南海诸国图，除了地名不易辨认外，其地图与今日的没有太大的不同。十九世纪时所绘的石叻门景观，与今日的石叻门倒有很大的分别，据说是1848年时炸开的结果。对于星加坡或者半岛的景物的进一步了解，对于培养我们的乡土观念是有帮助的。象看了本书注解里对胡亚基的介绍后，黄埔路与明地迷亚路就给了我不同的印象。

本书的第二章是《新加坡名称的探索》。作者从最古的皮宗到最近的新加坡，一共罗列了十二个，从出处的考据到不同学者的分歧点，以及某些指明尚属模糊的观念，都作了扼要的介绍，虽然读来颇枯燥，然而毕竟是研究本岛历史的重要资料，耐心的阅读后，仍觉得获益不浅。可惜这些古名的探索，只局限在中国史籍所提供的资料里。象作者附识的陈育崧的记录，一共有二十三个新加坡名字，是来源自西方的典籍，却又缺乏介绍。同时这二十三个名称中最早的也只是1511年时的记载，因此似乎还不是较齐全的。其他如暹罗、印度等国家的文史资料里，相信也该有星岛的古代资料，可惜作者除了提起爪哇对单马锡的记载外，其他则忽略了。

我是一个普通的读者，对史籍涉猎尤少。因此能从作者的引经据典里得到有关自己出身地的记载，感到非常高兴。其中最感兴奋的，还是作者介绍了许云樵对新加坡正名的解释。许教授认为狮子城 *Singapura* 是由 *Pali* 文而来的，因为 *Pali* 文在早期的东南亚是佛教传播的媒介。他还举出宋卡和室利兰迦的原名，引证狮子城是一种

极普通的印度化地名。这样的假说，不但消灭了狮子城的神秘性，也能联想到早期印度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

第三章第一节写新加坡岛的形成。作者介绍了地质学家对巽他陆棚、巽他弧、及今日的东南亚地形的解释；然后再由考古学家的考证，说明新马该是猿人南移的桥梁。第二节是原始社会的叙述，作者从一万多年前存在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淡板文化 (Tampan Culture) 比较了中石器时代的货平文化 (Hoabinhian Culture) 和新石器时代“原始马来人”的文化。再从马来亚所发现的稀少青铜器和直到公元后才存在的铁器，介绍了从外输入的青铜器和铁器时代。

这一章的史料非常充实，作者辛勤阅读，引据了许多可贵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的研究成绩。我们也能从作者取材的重点，看到作者对原始社会的分析，基本上是应用了正确的史观的。然而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也产生了一些疑问，想在这里请教于作者以及读者们。

(一) 作者认为人类远祖分为二支，一为后来绝灭的“古猿人系” (Pataeoanthropus Stem)，这系以爪哇人与北京人代表；二为演化成今日人类的“新猿人系” (Neoanthropus Stem)。我怀疑人类的远祖是否这么分法呢？我先引《读者文摘世界大地图》1968年版的人类进化表来质疑。表上的五十万年前该是原始人类的开始，然后按时间先后有爪哇猿人系 (Pithecanthropus group)、尼安德特人系 (Neanderthal group)、新人 (Homo sapiens)，然后才是现代人 (Modern Men)。香港真知出版社的《人类的进化》，也把原始人类分成猿人 (有爪哇猿人和北京猿

人)、古人(有尼安德特人、河套人、马坝人、长阳人、丁村人)和新人(有克罗马农人、山顶洞人、四川资阳人、广西柳江人、札赉诺尔人等)。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的《劳动创造了人》，也把原始人类的发展分成与《人类的进化》一样的三个阶段。

作者提出的古猿人系的“灭绝”一词，也有不妥当的地方。这里似乎否定了人类的进化是由落后到进步，从猿人到古人到新人的阶段。《人类的进化》一书，相信有更大的参考价值。

(二)作者笔下的三种马来亚的原始民族的进化情况，与余寿浩著的《马来亚古今谈》的报导有所抵触，到底谁的较可靠呢？本书把先诺伊人(Senoi)说成较落后的，而余寿浩则认为他们文化程度较高；本书以矮黑种人(Negritos)发明吹筒，有农耕知识，而后者则认为他们从先诺伊人学来吹筒的技术，过着采集和狩猎的生活。雅贡(Jakun)人的叙述就大致相同。到底谁对谁错呢？相信这不应该有太大的困难解决吧！

(三)掀开马来亚文明历史序幕的属于印度尼西亚种族的混血马来人(Dentero Malay)，是原始马来人的直系后裔与其他部落或种族通婚混血的结晶，到底是从那里来的？从印尼来的吗？作者没有交代。他们是否就是今天马来民族的祖先呢？这些始末的交代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进行驳斥马来沙文主义的论调时，将能提供有力的帮助。

(四)作者认为半岛的原始社会发展是非常缓慢的，其原因非常复杂，但是，“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地理环境的影响作用，因为马来西亚并没有可借原始采矿方法开采的

铜铁，使原始马来人不能提高生产力，发展出比较高级的社会制度。”

这个结论是非常重要的，应该认真探讨。然而作者语焉不详，我愿在理论上引述一些历史观点作补充，希望有识之士加以比较分析：

“地理环境一直对社会的发展是有影响的，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影响的程度却不一样。在人类历史的早期，生产的发展对于自然条件依赖的程度比较大。在生产高度发展的条件下，这种依赖性就日渐减弱。

“人摆脱自然界的支配，不是离开自然界，而是越来越深刻地去认识自然界，并且越来越多地利用自然界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由此可见，地理环境能够加速或延缓生产的发展，然而不能成为决定社会生活变化的原因。”

如果能从马来亚的矿源分布作些补充，相信也会使得作者对原本的看法产生怀疑，可惜笔者无能为力。

提了上述四点的疑问后，我对本章还有一点意见：

作者在本章的末尾，曾作了重要的结论：他认为外来的青铜器与铁器的传入，使混血马来人的生活起了激烈的变化，他们开始在河畔地区开辟小型的水田，并改进旱稻的生产方法，促使生产量提高。因此，他们开始过比较稳定的社会生活，再加上对外的商业活动，生产力的发展就加速了原始社会的解体。随着奴隶制度的幼芽开始抽发时，原始社会就正式崩溃了。但是原始社会的解体过程是怎样的？马来亚的奴隶社会情形又是怎样的？本书并没有答案。作者在接下来的篇章中，也不再分析社会的性质问题。这应该是本书重要的缺陷。

第四章是《新加坡早期史的钩沉》。第一节里附上的一张汉使往返印度路线图的部分地理名称，与内文的叙述不符合，这是作者应该设法改正的。作者对皮宗、蒲罗中和罗越等名称的叙述与探讨，也有一定的意义，对于认真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的有志之士更为重要，可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就不可能有自己的见解了。我谨希望能有人继续认真的进行发掘遗迹，研究史料，从而作出更加精确的判断。

新加坡从公元三世纪到八世纪的四百年间，没有在中国的古籍中出现过，主要的原因是否有如作者断言的，是由于航海技术的限制和马来群岛的水域海盗横行的缘故呢？作者似乎只能从克拉地峡的黄金时代的产生加以佐证，这是不足够的。如果说航海技术不够发达，那么为什么在这之前又有了汉使前往在印度半岛东岸的黄支国的“单舸”呢？马六甲海峡的航路被废置到底有多久？公元五世纪时东晋法显取经往来南海中国间，不都是取道马六甲海峡的？七世纪初隋炀帝不也派使乘“五牙舰”沿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沿岸航行吗？也许作者认为其他书籍里，已经把这些原因阐述清楚了，不用赘述，那么我们又要埋怨作者不把出处说明。我觉得尤其是誊写我国古代史的作者，对重要的、尚待证实的论断，应该不厌其烦，作些必要的引证，就如本书其他部分所做的许多引证一样。

作者在本章的末尾作了这样的总结：

“总而言之，‘单马锡’是新加坡古代的名字，但是史迹无可稽考，只凭臆度，所以新加坡的历史，只有从狮子城建立草起，而这个建国的事迹见于《马来纪年》中。”

这一个“总而言之”是颇令人反感的。作者也许是围

于目前的政治形势，强求要替新加坡国找寻其自成一国的历史源流的缘故。然而，马来亚半岛与新加坡岛的历史，不论从古代人种的迁徙，分布情况，从古代社会到外来青铜与铁器文化的输入时期，从与中国、印度、欧洲各国或者印尼、菲律宾以及其他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再从较近代的历史，即使是传说多于史实的新加坡拉王朝和马六甲王朝的发生与灭亡来看，我们都会发觉，它们是不可分割的。马来亚的现代史，尤其是马来亚的民族运动史，更是事实昭明的说明了这点。即使从本书的内容来看，各章的叙述，都必定要带入半岛的历史来写。两地的历史是血与肉的关系，勉强分开来，不但吃力不讨好，而且有舍本就末的缺陷。因此，作者不顾分割历史，甚至违背史实的错误，企图替新加坡整理出一套单独的成文历史，是必须加以纠正的。

第五章叙述早期新加坡与中国的往来。作者认为唐末时移民大盛，是中国人大批移植南洋定居的开始，当然是有所根据的，可是把它当成是黄巢起义攻陷广州的结果，却与真相不合。原来唐时，广州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通商口岸，唐皇还在这里设了节度使，专司收税。那时亚洲各国商人都云集在这里，唐朝的商船更是来往南洋频繁。到了唐朝末期，人民的生活已经越来越困苦，尤其是农民们更被逼得走投无路，时常得逃离本乡，象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便是“逃户”们在没有出路情况下的一条出路。广东福建的农民却多了一条出路，逃到南洋来耕种谋生。因此这应是唐朝统治者压迫的结果。及后黄巢起义，本来只有十万人的军队从福建打到广州时，竟扩充为几十万的队伍。这应该是起义军得到农民拥护的最好说明，怎么会是

移民南洋的主因呢？再说，由于黄巢起义的影响，南唐时的统治者就采取了薄征赋的两面手段，维持了一个较安定的江南社会。因此从黄巢起义后，移民没有加速，就更可以看出作者对唐末移民的结论是太过匆促的。

第六章里关于传说性质较多的新加坡拉王朝的故事，是很引人入胜的。这些传说正如作者所说：

“《马来纪年》的作者，并非把神话当作是史实，而事实上，在当时苏丹统治的社会组织下，马来史家是借用神话故事，以表达人民对苏丹暴戾不公的不满情绪，而作者巧妙地利用神话或寓言，作为间接批评苏丹的一种工具。”

马六甲王国的建立者到底是五世王 (Raja Seca-nder Shah) 还是巨港王子拜里迷苏刺呢？作者提出这样的问题，可以看出作者阅读之广，记忆之博，也表现了一种认真求知的精神。

《马来纪年》的记载是神话多于史实的，但是新加坡拉王朝是以其遗迹令人信服的。“可惜的是，当时殖民地政府并不注重这种历史古迹，而被工部局拆除掉。”

新加坡拉王朝的一百年繁荣，由于爪哇人的侵略而灭亡了。据说后来的四百多年，只有一小部分的土著“海人”继续他们的传统生活及少数华人移殖到这里拓荒。到底这个时期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向史学家要答案，是否不情之求呢？从这里，我联想到这些热心写本地史的学者们的工作情况，不禁感叹它们的孤单无援了！

高尔基与造神说

再次读《母亲》，仍旧是一口气读完的。感触仍然不少，然而结合起自己的经历来看，这些感触也必然是肤浅的，不值一提的。

只是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颇耐人寻味的段落。

如第一部的第十一章里描写雷宾和巴威尔对上帝问题的争论中，就有一些相当奇怪的言论：

“巴威尔说：‘我讲的不是妈妈信仰的那个善良仁慈的上帝，而是神父们当作棍子来吓唬我们的上帝，……’

.....

“雷宾说：‘照我的说法，用我们伙伙的话来说：上帝好比一团火！就是这样！他活在人们的心灵里。……’”

这些类似的谈话，最少不是澈底的无神论的观点。这点，作者似乎也是知道的：

“有时，在这些否定上帝的话的背后，她感到还有一种对上帝的坚定信念。”

即使在充满战斗激情的“五一”示威这一章（第27章）里，也出现下列的令人犹豫的谈话：

“霍霍尔说：‘现在，为了新的上帝，光明和真理的上帝，理性和善良的上帝，我们正举行一次神圣的进军！

.....’

.....

“‘您不用担心，’母亲喃喃地说：‘这是神圣的事情……您想想看——要是人们不为基督去赴死，也就不会有基督了！’

“母亲的脑子里突然出现了这个想法，它所包含的明白简单的真理使她不胜惊讶。”

高尔基是肯定这个看法的。

在第二部的第8章里，母亲已经是积极的革命支持者了，然而作者却是这样描绘她的思想状况的：

“她祷告的次数不知不觉地日益减少，可是，却越来越多地想到耶稣，想到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提起耶稣的名字，好象连耶稣都不知道。但是，母亲觉得，他们却遵照耶稣的箴言生活着，并且和耶稣一样，也认为世界是穷人的天下，希望把世上的全部财富平分给一切人们。……她觉得，她一向用模糊的热情——恐惧与希望、感动与悲伤紧密交织的复杂感情热爱着的耶稣，现在和她更加亲近，和以前不一样了——变得更高尚、更具体、更乐观、更英明了。”

在第17章里，母亲向塔齐扬娜讲起自己儿子的第二次被关进监狱的原因是——“因为他懂得上帝的真理，公开传播真理。”

第28章时，满怀热情的母亲竟然会因为很久没有出现过的要祈祷的愿望，重新激动起来。母亲的激情继续发展着，然而却这么说：

“这正象给了人们一个新的上帝！一切为全体，全体为一切！”

这里引录出来的几段文字，与这本小说的近三十万字来比，数目上是很小的。我在这里提出来，也许有断章取

义，或者曲解之嫌。然而在阅读了一些有关高尔基的作品后，我却以为这些奇怪的段落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让我们先看看高尔基在创作《母亲》前后的思想历程吧！

×

×

×

高尔基所处的时代，差不多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从崛起、发展到壮大的时代，因此高尔基的工作和思想活动，必然的和这个政党发生了有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社会民主工党长期以来都得和各种形式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投降主义作战斗，而且首先正是击退了来自内部的各种敌人后才能够发展起来。高尔基处身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可避免的被卷进了这些斗争中。

原来自从俄国第一次革命（1905——1907）失败后，少数派和多数派中的许多知识份子，开始对革命的信念产生动摇。同路人是在革命汹涌高涨时期从资产阶级方面跑进革命队伍的，他们一到反动时期就离开了。其中一部分跑进了公开与革命为敌的阵营，另一部分则盘踞在保全下来的工人阶级的合法团体中，他们竭力去迁就反动势力，想同沙皇制度和睦共处。

这种反革命势力在思想战线上也大举进攻，“不到半年就出版了四本书，这四本书主要是并且几乎完全是攻击辩证唯物主义的。”这些作者中包括了卢那察尔斯基、巴札罗夫、波格丹诺夫等。“造神说”便是他们泡制的。在文坛上尤其形成一种反动的文学思潮。这种学说企图调和革命理论和宗教思想，创造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宗教。在政治上这些人或者属于公开反党的“取消派”，号召断绝与秘密党的联系，只搞合法工会；或者属于“召回派”，在革命词句的掩盖下，要求召回社会民主工党在第三杜马仅

存的18个代表，停止和一切公开团体的联系，企图孤立多数派，从而消灭它的生命力。

这个时候，高尔基虽然身在国外，却尤其受到“造神说”的影响。1906年写成的《母亲》，如果与1908年写成的《忏悔》来比，后者的“造神说”的色彩，则显得非常突出了。《忏悔》的故事非常沉闷，说教味、哲理味很浓厚。这里只举两个例子。

“人民觉悟到人类需要平等的一天，就是基督诞生的那一天！许多的人民都各异地在企图把自己关于正义的推想生动起来。创造一个平等的上帝，并且不仅一次地各个人都感应着人民的思想在那里努力着把它铸成固定的名称使它永远生存，等到这些思想结成果实的时候，就从它里面产生出活的上帝，人民所钟爱的儿子——耶稣基督！”

本书的最后一段写着：

“因此，我就回到世界，在那里人们的灵魂密切的结合在一起，从黑暗的迷信的囚牢里解放出来，在人民的群集里消灭了私人的面目，帮助他们觉悟自己的伟大力量，向他们指示出唯一可靠的道路，走到整个社会的伟大事业——全世界创造上帝的欢欣！”

如果连《忏悔》这样的例子，还不能很好的说明高尔基的某些作品中的毒素，那么作者在1913年为攻击莫斯科剧院公演的，陀思妥也夫斯基写的小说《魔鬼》（改编为《叫嚣》），所写的文章里，就有较直接的表露了：

“至于‘寻神说’，应当把它暂时搁下，这是一种无益的事情：没有放东西的地方，没有什么可寻找。没有播种，就没有收获。你们那里没有神，你们还没有把它创造出来。不要寻找神，要创造神；不要虚构生活，而要创造

生活。”

高尔基受“造神说”的影响应该可以肯定了。对待《忏悔》这样浸透了“造神说”的毒汁的作品，是应该批判并摒弃的。高尔基在较后的日子里也对《忏悔》表示厌恶。然而我们又该如何评价《母亲》这部小说呢？

×

×

×

据说《母亲》的故事与作者于1902年，生活在索尔莫伏的革命工人间有密切的关系。能够指出姓名的许多革命工人都是他当时的朋友。

然而作家巴甫连柯在《回忆阿·马·高尔基片断》中却有不同的推测：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相信，这部作品是从巴库和梯弗里斯的一位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彼得·茅青的母亲那里‘抄来的’。我跟我父亲曾在茅青的家里住过。我记得我的这个看法还得到过很多人的支持，——因为茅青家的生活同高尔基根据尼日戈罗德的材料所描绘出来的情况是那样的相象。可是，我在巴库还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作为高尔基中篇小说《母亲》的素材的是，巴伊洛夫（巴库附近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工人家庭的故事，高尔基与这个家庭有着非常亲密的友谊。”

关于《母亲》的取材，也许还有很多种说法，然而这不正好说明作者笔下的主人翁是有扎实的生活基础的。

要评价《母亲》的意义，最有代表性的也许要推当时的俄国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伊里奇吧！他是从文艺的最高使命来分析的：

“这本书是我们需要的。许多工人参加革命运动只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现在他们将会从阅读《母亲》得到

很大的好处。”他还指示了这部作品的基本意义在于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进程：先进的工人运动理论已经和广大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了。他还赞赏《母亲》是“及时”的作品，书中的英雄人物具有普遍和典型的意义。

今天，我们阅读了《母亲》后，也一样能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代表俄国的新世纪的母亲典型，仍旧是我们学习的样板。

那些在《母亲》一书中透露的“造神说”的邪气，是不足以破坏母亲和巴威尔的形象的。《母亲》的划时代的创作意义并没有被削弱。

×

×

×

对待干部与“造神派”的关系，伊里奇的看法是很具体的，他要求结合实际情况去分析，而不是教条的去看待持有这种看法的人。《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中，有这么一段话：

“一个鼓动员或一个在对工人群众讲话的人，为了说得明白一点，为了给自己的解释开一个头，为了用不觉悟的群众最熟悉的说法更具体地说明自己的观点，而说了这样一句话，这是一回事。如果一个作家开始宣传‘造神说’或‘造神社会主义’，那是另一回事。在前一种情况下，提出申斥就是吹毛求疵，……在后一种情况下，申斥却是必须而且应该的。”

伊里奇对高尔基的“造神说”的观点，提出了很严厉的批评。象在1913年11月中旬写给他的信里，就针对他写的剧评说：

“原来，您反对‘寻神说’仅仅是‘暂时’的！！原来，您反对‘寻神说’仅仅是为了要用‘造神说’代替

它!!

.....

“寻神说同造神说、建神说或者创神说等的差别，丝毫不比黄鬼同蓝鬼的差别大。谈寻神说不是为了反对一切的鬼神，不是为了反对任何思想上的奸尸勾当（信仰任何神都是奸尸勾当，即使信仰的是最纯洁的、最理想的、不是寻来而是创造的神，也是这样），而是要表明蓝鬼比黄鬼好，这比根本不谈还要坏一百倍。

.....

“您知道小市民灵魂的‘脆弱性和可悲的动摇性’，而您却拿最甜蜜的、用糖衣和各种彩色纸巧妙地包着的毒药来诱惑他们的灵魂!!

“真的，这太糟糕了。

.....

“我一边读您的文章，一边在探索，怎么能够在您那儿发生这种笔误，但我莫名其妙。这是怎么回事？是您自己也不赞成的那篇《忏悔》的残余吗？是它的余波吗？

“或者是由于另外的原因，例如您想离开我们的观点而去迁就一般民主的观点这种不成功的尝试吗？也许是为了同‘一般民主派’谈话而打算象同孩子说话那样奶声奶气吗（请原谅我的这种说法）？也许是‘为了’向庸人们作‘通俗的说明’，您想暂时容许他的或者他们的（庸人的）偏见吗？

“但要知道，无论从哪种意义和哪个方面来说，这种做法都是不正确的！”

看来申斥是严厉的，然而伊里奇对高尔基的关怀也是溢于言表的。在1910年的《出版者的话》里，有这么一

段：

“即使高尔基同情马赫主义和召回主义，在我们的文坛上，他的贡献仍是巨大的。”

可以这么说，从1908到1910年，伊里奇写给高尔基的信，都是针对“造神派”开火的，他很有耐心的解释波格丹诺夫的哲学的本质，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也是修正主义的。波格丹诺夫妄图调和多数派和他们这一群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矛盾，妄图调和战斗的唯物主义和马赫主义的矛盾。但是在伊里奇的信里，并没有把高尔基和波格丹诺夫并列，而且他认为“造神说”以及其他高尔基的幻想，与高尔基作品的基本内容是不协调的。高尔基与革命已经有了太密切的关系，和那些小集团是不能混在一起的。他自己就曾这么说：

“我要告诉你，革命就象胎儿在母亲肚子中的颤动一样，完全是一种正当的、健康的生命现象。而俄国的革命，虽然有很多缺点，它和被人称呼为最卓越的‘精神美感’和‘热爱世界的力量’的东西，最少是相等的现象。”

×

×

×

高尔基终于逐渐的洗涤了“造神说”的坏影响，然而他的前进过程，此后也不是没有波折的。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沾上了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观点，签署了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声明；俄国的二次革命后，高尔基一时也还徘徊在革命队伍的后面，为了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民主，胡乱攻击革命政权的镇压措施。

伊里奇给高尔基写了许多信，批评他的错误。高尔基在事实面前，经过了一连串的恶梦后，也终于醒过来了。

“从1918年那一天发生了企图谋杀伊里奇的卑鄙的

行为开始，我又重新感到自己是多数派了！”提到他和伊里奇的暂时性的“不同点”，高尔基这么写着：

“就我的观点看，这些‘不同点’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他，一个理论家，证明了他对俄国的现实有更深和更好的认识……在我来说，我们的矛盾造成的原因，不只是因为认识事物理解事物的能力问题和理论的不可动摇性而已，应该还包括观察事物的角度。他具有一种罕有的能力，能够高瞻远瞩——从展望将来分析现在。而我想该就是这个角度，这种能力，就是现在人们都在讨论的，我们的文学所需要的一种新的东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础。”

高尔基在伊里奇死后，并没有就软弱下去。我们从他后来二三十年的工作里，看到他终于没有辞负了自己的亲密战友的期望。高尔基不只是对俄国人民来说，对于全世界的劳动人民来说，也是一位伟大的作家。

11·1·77

试评《在底层》与《夜店》

看完《夜店》的演出，连想的问题很多，可是都没有头绪。只好找剧本来，仍旧不得要领。在好长一段时间里，便收集起有关《在底层》的资料。在阅读的过程中，有更感迷惑的时候，也曾进入茅塞顿开的境界。然而现在虽然有可能把一些与《夜店》演出有关的意见写出来，读者们还是可以看出笔者在许多地方，仍旧是踟蹰不前的。

×

×

×

首先让我们看看《在底层》写完之后所得的反应吧！这里摘录自《回忆马克西姆·高尔基》，作者是吉列棱夫：

“当高尔基把为《艺术剧院》写的剧本《在底层》带到莫斯科时，它的第一次朗诵是在我们的《星期三》社举行的。他自己朗诵，他朗诵得非常好和引人入胜。……

“……第一次演出时作者被叫出台有二十多次。

“检查官很久地坚持着不准剧本上演，删改原文，加以阉割，但毕竟对社会压力作了让步，准许上演。

“……我想引用克·斯·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本人写的话来作证，他说这次演出有‘震动人心的成功’。

“也应该指出，1943年除夕是《在底层》上演四十周年。这剧本在艺术剧院已经演出了1067场。而在1946年高尔基逝世十周年那时，剧本《在底层》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演了第1207场。”

从上面的叙述和师陀为《夜店》所写的《赘言》里，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在底层》的演出，是受到很多观众的拥护的。其中还包括了伊里奇：

“我记得伊里奇是那么渴望着能到艺术剧院去看《在底层》。”

有一个苏联作家，也许更象是教育工作者马卡连柯，写了一篇《在我的生活中的高尔基》，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

“《在底层》就其意义来说，是一部无可比拟的作品。我直到现在还认为它是高尔基全部丰富的创作中最伟大的一部，甚至高尔基最近对自己的创作发表了那些有名的意见，也没有动摇我这个想法。路加一面说谎一面安慰人，他这种行为当然不能算是我们时代的模范行为，而且从来也没有人拿路加来做模范。这个形象的力量完全不在于它的道德价值。如果路加宣传多数派的纲领，并且向夜店的住客发出号召，那未必能使人信服……何况，他能号召他们去做什么呢？我始终认为，《在底层》乃是全世界文学中最完美的新时代的戏剧。我把它称作一出悲剧，并且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感觉，虽然在舞台上悲剧的成分可能由于某些误会而被冲淡了。路加这位随身带着万灵药的狡黠老人，正因为他对人亲切，然而又无力帮助别人，才能以惊心动魄的形象指出夜店全体寄宿者的注定灭亡和绝望，并且意识到这种绝望的恐怖。路加是极度紧张的形象，这表现在他那聪明的、无情的深谙世故和他那同样聪明的悲天悯人的心肠之间的极端的矛盾。这个矛盾的悲剧性本身就证明了这个剧本的价值。但在剧本中还有一条更富有悲剧性的方面，这就是‘在社会里’被遗忘的人们注

定悲惨的灭亡和他们那种真诚的人性美之间存在着的分裂现象。高尔基的伟大天才在这个剧本里表现在好几个方面，并且到处都表现得同样的辉煌灿烂。在这里，每句话都闪耀着他的天才，每句话都是艺术作品，都能激发人的思想和感情。……

“《在底层》首先引起人的责任感，换句话说，就是引起人的革命思想。”

马卡连柯对《在底层》是推崇备至的。

笔者在几年前读过这个剧本时的印象是新鲜动人的，但是总觉得被一种阴影笼罩着。现在再次读完剧本后，这种阴影在我的眼前逐渐化开，我似乎看得见这里面包含着一些毒素。因此我斗胆的在这里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

剧本中的主要人物的形象，应该能够帮助我们判断一部作品的创作意义的。

路加从一出场到他已经离开的最后一幕，由他说的台词和由别人口里引述的谈话，起了这样的效果：他这个慈悲的老人，在许多干枯的灵魂里，滴进了甘露，使得他们对无望的人生重新有了希望。即使可怜的安娜对灵魂的归处有了信仰后便死去；即使失去了名字的演员，因为路加的安慰，竟然储蓄起钱要到一个不知在何方的医疗中心去治病，然而在戏终时却令人意外的上吊死去；我们仍然无法因而识穿路加的欺骗性，我们也无法从剧中去憎恨路加。

路加鼓励华加带其爱人娜答莎出走，到西伯利亚去，而且警告他不要接近女房东；第三幕，一大堆人在围观女房东如何虐待娜答莎时，也只有他敢和女房东正面冲突，以致被房东赶走。路加不但在娜答莎的心目中是圣人，在 59

虔诚的回教徒——一个鞑靼人的心目中也一样。即使沙丁这一个贫民窟里的领袖，也在第四幕时衷心的赞美路加。

路加显得很健谈，也很有见识，在这些失落的一群人里，他对什么问题都有看法。而且对于穷人很同情，很会顺从人家的意思，除了对女房东之外，他似乎不曾抵触别人，他宣传：“懂得同情别人，才能救人”，也认为耶稣博爱的精神要推广。然而在路加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矛盾：一方面他满口安慰的话；可是一方面他也知道自己讲的都是不着边际，于事无补。其实他做事也不是光明正大的，他明知女房东与华加的谈话很秘密，出去后却暗中爬上床架偷听；他一个时候要人同意世界上没有一块存在真理的土地，另一个时候又认为凡事只要努力就行。或许他的思想中心，就象他对妓女娜雅讲的一样：“相信就有，不相信就没有。”受苦的人们一定要相信，总有一天会活得好：酗酒的可以去戒酒；就要病死的要相信天堂在招手；要自由恋爱的跑出去，即使到西伯利亚也好过呆在这里。但是，治疗酗酒的医院在那里？谁才能负得起庞大的医药费？临死前连人家施舍的一碗汤团都不舍得吃的贫苦，什么时候才有个完？西伯利亚真是一个好去处，沙皇为什么会放逐犯人到那里去？路加是不管这些的了，事实上，路加又怎么管得了！

关键还在如果作者不是要路加成为一个指路人，那么最少作者要我们听从路加的一些指示。可是一个到处流浪的路加，或许就是一个到处寻找奇迹的香客，不工作，只会讲话，又怎么可以和1902年前后俄国的沸腾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呢？路加与那些不惜流尽热血的革命工人、农民、知识份子，更没有共同点。相反的，在风雨飘摇的时

代，革命志士更须与各种奇形怪状的、带上各种面具的，也代表了各个不同阶级利益的反动份子斗争。路加不是革命志士，正象马卡连柯说的一方面：“如果路加宣传多数派的纲领，并且向夜店的住客发出号召，那未必能使人信服。”但绝不如马卡连柯下的结论，把反革命说成是革命。作者正面的去处理这个人物，根本就是一种错误，而且是严重的错误。

高尔基在1932年写成的一篇论文《论剧本》，其自剖是够清楚的。我们这里先引录涉及路加的部份：

“最可恶的一种安慰者是虚荣的，是玩弄别人的苦难而在自己眼中自命不凡的卑鄙的人，是一个想做个显著的，不仅受尊敬，而且也受敬爱的小人。这样的人民是不少的。最后，还有大量的安慰者，他们安慰别人，只为了使他们不要发牢骚来厌烦自己，使他们不要扰乱一切惯常的冷静的人的宁静。对他们最珍贵的东西正是这样宁静，这是他们的感情和思想稳定的均衡。因此，在他们看，他们自己的包袱，自己的水壶和煮食的提锅（路加的打扮特征——引者注）是很珍贵的，他们宁愿提锅和水壶是铜制的。这许多安慰者是最聪明的，熟练的和雄辩的人。他们因此也是极有害的。剧本《在底层》里的路加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安慰者，然而我显然不善于写成这样的安慰者。”

如果路加被写成如上所分析的形象，这个角色的意义又不同了，然而路加却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们观众对他抱有好感，甚至含有希望的样子。

再看另一个生活在底层中的领袖——沙丁。沙丁所以会被尊敬，特别是受过气男爵的尊敬，是由于他也有一张善辩的口，他很少安慰人，然而世事似乎早就被他看透

了。实际上，他却是一个流氓无产阶级，社会的渣滓。不愿工作，鄙视靠劳力换取面包的人。他就是靠欺骗、靠赌博、靠借钱过日子的。他对什么世俗观念都是不置可否的。譬如鞑靼人指责他们赌牌时玩臭，他反问为什么要公平，他说赌博就是要赢钱的，赢了钱他们才能去买酒喝。沙丁不相信神，认为人类就是一切，而且指的不止是用手创造世界的人，还包括一切人。持有这种观点，和沙丁的行动并不和谐，我们看来也可以把他归入只会用言语（当然他利用的语言与路加的不一样）安慰别人的人。

沙丁给观众的印象并不如路加深刻，然而第四幕的沙丁差不多有取代路加的趋势。还好，第四幕很快就结束了，沙丁给观众的误导性少了些。

富有反抗性的华加，在这个剧本里，倒是戏剧冲突的中心。华加以前和女房东好过，后来改成对其妹妹一片痴情，然而凶悍的女房东用计杀死了房东后却嫁祸给他，华加便身陷牢狱了。华加的出场不多，但是性格是硬朗的，给人的印象还算带点冲劲，可惜这个人却是个小偷，即使他成功带走了娜答莎，他真能改行，做个靠劳力吃饭的人吗？这个人不会有太大希望的。

我们还应该提起锁匠克拉斯，一个勤劳工作的工匠，由于生意不好，不得不经常忍饥挨冻，年轻的妻子也因为久病不医死去。可是克拉斯是一个忠实的人，他看不惯沙丁等不务正业的生活，也鄙视路加的无济于事的安慰。他不认为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不幸，却提出做人要有良心和信誉；在他妻子死后，生活更加潦倒，他一度变得愤世嫉俗起来，憎恨起每个人。不过，孤立的克拉斯，最终还是混进了沙丁的圈子，随他们一起胡闹过日子。

克拉斯在这个环境里，也许就只有这个下场，可是作者似乎还应该，也有可能在这个底层里，发掘出有希望的人物。

《在底层》写的就是这么一堆没有前途的人物，作者的写作动机是想提醒他们，还是谴责他们，或者更多的只是出于同情他们？本地作者涵清君是这样评介的：

“它描写的是流浪汉的生活，在这里，被损害与被侮辱的人并不在‘上层’面前暴露自己的创伤，请求同情。虽然，他们衣衫褴褛，贫穷疾病，但他们有独立的人格，象剧中主人公沙丁所说自由，骄矜的词句中反映着一种新的历史力量的思潮，新的历史力量标榜出‘用自己的手’从资本主义奴役中解脱出来的口号。”

笔者显然不能同意上述的意见：结合了沙丁的阶级特征和在剧本中的言行来看，沙丁无宁说是一个厚颜无耻的人。历史上的许多经验，包括俄国的革命经验在内，说明沙丁的身份流氓无产者，是没落的阶级，很多时候在历史上起着反动的作用。他的那些哲学性的谈话，根本是软弱无力，虚伪而带欺骗性的，当然更不能反映了新思潮，沙丁更与新的历史力量搭不上关系。也许最有可能导致涵清对沙丁另眼相看的是这一段话：

“人们不会对你象狗般的过活感到羞耻的。你想想吧！如果你停止工作，我停止工作，还有其他上百上千的人，每个人都停止工作，没有一个人提起一根手指来做一些工作，那时候将会怎样呢？”

这些话由沙丁来讲，不是讲得不澈底或者不清楚的问题：即使当成一种软弱的呼声，沙丁也是有替自己的偷懒、好逸恶劳做辩护的嫌疑。

《在底层》写的这一群贫苦的下层人民的生活，不是俄罗斯社会的缩影，因此我们无法从剧本展开的情节中，窥见一斑。作品的人物也都局限在一小群无助的小市民身上，没有代表新生力量的人物上场。剧本中的矛盾在要求变革的社会里，是次要的，不显著的，没有典型意义的。

吉洪诺夫追忆高尔基的文章：《在涅瓦关外》，有提到一个工人对高尔基写的文章的意见，下面是几段对话：

“‘您描写得很好，很明白，但如果真正说起来，您写的不是需要写的东西。’

“‘您为什么这样想？’

“‘譬如这样说吧，我想您会同意我的，每个阶层都应该有自己的文学。嗯，那儿有屠格涅夫，格列勃·伊凡诺维奇·乌斯宾斯基……假定说教士们有列斯科夫等。比如说您，据我所知，是职工。可见是我们队里的鼓手，可是您脱离了我们，真气人！您写些什么流浪者、酒徒。他们有什么意思？是废物，不会再好些。’”

看来，这段记事的日期应该在1898年之后不久。工人普拉东指的高尔基的作品，当不包括《在底层》。然而他的这些意见，对《在底层》来说也是适合的。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本剧，而不是高尔基的其他剧本，吸引了那么多的俄国观众呢？这个问题笔者懂得很少，可是又不得不在这里提出一点看法。

《在底层》所反映的生活面虽然不广阔，它却能一反以往俄国剧本，甚至是世界剧本的风格，以其他作家不能比拟的眼光，发掘了这个处在社会最底部的题材，让那些素来被社会瞧不起的人，占据了舞台。作者虽然对人物的分析不力，然而他是衷心同情他们的遭遇的，而且在他笔

下的几个主要人物都写得自然，语言也生动，再加上舞台气氛的营造和演员的逼真表演，《在底层》还是颇有吸引力的。

观众们对高尔基的尊敬和热爱，应该也是《在底层》被特别垂爱的因素之一。

在沙皇时代，对于一般演出活动的严厉钳制，也造成一般观众的强烈的心理反应，因此一个受到阻难的剧本最终能搬上舞台，自然更易引起观众的同情和共鸣。

上述的只是笔者个人的推测，不可尽信。

我们这里有一位作者卫道君曾经著文赞美这个剧本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剧本”。他还对此有所阐释：“这里所说的真正的现实主义剧本，指的是那些用高度的艺术概括手法创作的，取材来自现实生活，有高度的思想性，完美的艺术性和普遍的人民性的戏剧作品。”卫道君也认为“剧本的思想性很深刻和很有意义。剧本作者用大力批评和揭露的手法，把被抛到贫民窟的，生活在底层的人们介绍到舞台上去，发出了严厉控诉的最强音。”作者还就剧本的取材和细节描写的真实、以及语言的性格化，赞誉本剧有“完美的艺术性”。

读者们从我前面的文字里，当然知道我与卫道君基本上有不同的看法。然而我自忖没有能力很好的说服卫道君，倒是高尔基对于自己的剧本《在底层》的分析，也许能给予卫道君一些帮助。

就请恕我再引述《论剧本》里的几段文字吧！

“最后，我必须讲讲自己的东西，因为有一种危险，就是我那些现在过份被赞扬的‘剧作’，会引青年人对它作无益的研究，而且更坏的是，会引诱他们去模仿它。我

们的批评家通常赞扬和谴责都太匆忙，然而阅读却是不够好的，不够细心的。

“

“我写过二十部左右的剧本，它们都是或多或少联系得不够的场面，在这些场面中，情节的路线完全是不连贯的，而性格是没有写完的，是不明显的，失败的。戏剧应该是严格的而且要通过效果，只有在这条件下，戏剧才会作为我们的时代迫切需要的，现实的情感的鼓舞者，我们的时代需要战斗性的，火焰般的话语，这种话语会烧坏我们的小市民的生锈的心灵。

“我的一个剧本在舞台上继续上演三十年之久，然而这是误解，因为它是陈旧了。……

“……从我所讲到这个剧本的一切话语当中，我相信，显然，这个剧本的失败达到了怎样的程度，上面所叙述的观察在里面反映得多么不够，而它的‘题材’是多么不好。《在底层》是一部陈旧的剧本，也许在我们今日甚至是有害的剧本。

“虽然这种‘自我批评’来得太迟了，然而我应该说，它的出现当然不是在现在——1932年，而是远在大革命以前。我认为，它对于那些过于匆忙和不经思索就把自己观察的材料写成作品的青年作者们，不是没有益处的。”

的确，这种“自我批评”是迟了点，然而它还是有作用的。可是，为什么苏联最少一直到1946年时，还是这么频繁的搬演这个剧本呢？我还无法弄清事实的真相，只是对于这个作者已经反复说明的有害剧本的仍旧上演，却是深感遗憾的。

由柯灵和师陀改编的《夜店》写成于1944年，改编者则属意这个剧本的时代为1935年。但我们是无法从《夜店》的演出效果，来窥测它应有的时代特征的。

《夜店》的故事情节与原著《在底层》是有区别的，而且可以写出很多条来，然而影响比较大的，应该是对第四幕的修改。改编者把赛观音写成一个用钱买通法庭的厉害妇人，结果赛观音不但逍遥法外，还要把自己的亲妹妹卖到窑子去；小偷杨七则被判坐牢十年。

改编者对赛金花的结局的改变，有思考不周的地方。原著中的女房东陷害了华加，却同样是锒铛入狱。改编后的女房东则利用金钱，成功的陷害了杨七，自己却另找男人，追求豪华的物质享受。这还不算，舞台上我们还目击了她用锥子刺伤小妹的残酷场面，这样就否定了原作者对女房东的某种同情。难道赛观音真的出于妒忌就这么凶狠吗？夜店里的生活也往往由于她的出现而闹得鸡犬不宁；相对的，夜店外的世界却似乎是河水不犯井水的。这么一来，观众们便非常憎恨赛观音，再加上对赛观音的神通广大的片面描写，这世界似乎就只有她最坏了。

实际上一个小客店的女主人即使谋夺了家产，怎会那么有钱在外面购置房屋、买汽车、养小白脸呢？改编者相信她的结局会更惨是一回事，戏里面有没有这么写则是另外一回事了。最重要的是这会转移了矛盾的焦点，观众们对赛观音的恶感，会大大超越于对这个万恶的旧制度的憎恨的。

上述的这个改动，是全剧唯一显著的触及社会关系的部份，然而它毕竟还只是事后提起，因此这种有代表性的社会关系便揭露得不深入了；它与1935年时代的中国社

会的联系，也无法从这里了解了。

那时候的中国，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势力和腐朽的南京政权加紧勾结，加紧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另一方面则是主张联合大多数人，击退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民军队的不断成长；当时生活在城市里的工人和知识份子，迷失方向的当然不在少数，然而也有一部分能分辨是非，看到民族生存发展的正确方向的。可是反映在《夜店》里的人物，却都是混沌的一群，谈不上有生活理想，当然更没有伟大的献身事业的精神了。改编后剧本中的矛盾，仍旧是琐碎的，不典型的，没有重大的社会意义的。

不过，《夜店》却清除了《在底层》所散布的许多误导性的人生哲理。象全老头只是一个好心的江湖卖药佬，路加身上的神秘色彩，全老头全没沾上。第四幕时众房客怂恿他收留石小妹，他表现的那种兴奋非常自然。后来他发现石小妹吊死了，悲恸得跪伏在地上，便完全是生活中的一个人物了。

四喜子有点象沙丁，但不是沙丁。他是一个清道夫，赌博时不会作弊，相反的，他有正义感，敢于和赛观音冲突，是一个有血性的人。但是生活在这个圈子里的四喜子，并没有给其他人带来希望，因为他也是在重重压迫底下苟延残喘的可怜虫。

改编后的《夜店》似乎是出自中国的故事，俄国的味道没有了。只是语言方面却仍旧表现了特色，值得赞美。

总的来说《在底层》改编为《夜店》，我们实是无法给予太高的评价的，这首先立足于《夜店》的思想与当时全民的斗争目标——打倒日本侵略者相差太远了。虽然改编者没有意思渲染悲观无助的思想，剧本的客观效果却正

是这样：昏暗的灯光下是一个残陋的杂居处，许多了无生气的人聚在一起，能拖过一天算一天，即使偶而出现了一点波澜——杨七要带石小妹离开这里，也是瞬间就失去了踪迹，最终石小妹吊颈而死，杨七被关在牢里，全老头哭倒在地，四喜子空发愤慨之言，其他人也等于经过了一场噩梦，而赛观音，每个人都对他恨之入骨的人，却扬长而去。这真是一个可悲的、无望的人生的缩影。

×

×

×

这样的—个剧本的思想，与本地的现实联系起来，将会造成什么样的效果呢？也许这软弱无力的感叹声，不仅是力度的大小问题，还有可能造成预期不到的反效果吧？！



9·2·77

漫谈《水浒传》

一百回本的《水浒传》，写宋江率领群雄投靠宋朝，消灭方腊的起义军。因此有好多作者批评《水浒传》是投降主义的作品。

双翼的文章就指出，由于作者受孔孟之道的影响，宋江在他笔下念念不忘的，只是何时被招安，何时能为赵皇帝效劳。

丘振声认为，由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此水浒的故事从南宋时代流传开始，直到元末明初由施耐庵写成止，都反映了儒家的政治与道德观念。施耐庵投靠了曾经多次投降元朝的张士诚，更容易说明《水浒传》里的投降思想了。

但是，《水浒传》里，似乎也出现了一些不符合投降思想的言论与行动。

先从结局来看，卢俊义和宋江先后被害死，虽然更能突出宋江的忠君思想，可是不也会给读者一个教训——投降的下场竟是如此不值得吗？

在宋江投降之前，为什么又要描绘李俊等好汉的造反精神呢？譬如写李俊与张横，不愿见到宋江随意释放了被俘的将领，自行杀了牛邦喜与刘梦龙；又写李逵、武松与鲁智深等人的许多次反招安的言行；尤其是在菊花会上，李逵还因而差点送了性命；这些描写的目的何在？

路，然而流行在民间的《水浒传》，又曾经过多少民间艺人、文人，甚至普通民众的补充与润饰！因此作者即使不满意李逵等的叛逆性格，有时候也是无所取舍的。象金圣叹是仇视水浒英雄的，他在腰斩了《水浒传》后，也只能生硬的给卢俊义造了一个噩梦，以表达他要置这批叛逆于死地的心意。

其实，这里就牵涉到今日应该如何评价《水浒传》的问题了。《水浒传》只是一部搞投降的反面教材吗？

康立把《水浒传》在明末农民战争中的反动作用，过分夸张了，似乎凡有投降的农民起义军领袖，便是受《水浒传》唆使的，而没有认识到这种接受招安的思想，正反映了一部分农民起义军的历史结局。然而即使是康立，他也不得不承认事实：“在明末农民起义队伍中，……有人喜爱反对招安的李逵，有人则崇拜屈膝投降的宋江，这说明了《水浒传》对各种人物的思想影响是很不相同的。”

正确的评价《水浒传》，是否必须推翻以前的一切看法呢？

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观点，也许还有些道理：

“《水浒传》的现实主义艺术力量，首先在于它真实而又生动地反映出北宋末年一次农民起义的生长、发展和失败的全部过程。……它描写的范围最为广阔，内容极为丰富，人民性思想极为深厚。从政治倾向性来说，中国其他的古典小说，都没有它这种鲜明的特色和强烈的精神。”

同时他也认为《水浒传》塑造的几个响当当的人物，如鲁智深、李逵和武松，深受读者喜爱，而不是宋江或卢俊义。

作家出版社编的《水浒研究论文集》，这么赞美了《水浒传》：

“《水浒传》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的起义军的英雄形象。这些英雄，是在革命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出来的。通过他们，我们看到了历代中国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质。作者热情地歌颂了英雄们对于自己的强大力量的自豪，歌颂他们团结互助，不畏困难，战胜恶势力的信心和气魄。”

南开大学中文系师生写于1972年的论《水浒传》的文章，也有参考价值。首先，他们认为《水浒传》比较深刻地揭示了残酷的阶级压迫，是造成农民起义的基本原因。同时也能从具体的情节描写中，揭示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其次，《水浒传》也比较真实地记录了武装起来的农民同封建王朝和反动地主武装进行英勇斗争的事迹，生动地描绘了农民起义军的战略和策略，给我们提供了封建社会的某些农民战争规律和战争经验。比较突出的是，他们还针对梁山内的招安与反招安的思想冲突，作了分析：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宋江既是农民起义事业的发展兴盛的一个重要因素，又是农民起义变质的一一个重要因素。宋江正是把思想中的一切复杂矛盾，又都始终交织在他的行动里，表现在他的领导路线上。

“《水浒传》在这方面同样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对我们今天进行革命斗争仍具有深刻的认识作用。”

我们要认清《水浒传》的主要倾向是投降主义的，尤其反映在宋江这个人物的塑造上。然而我们也要历史的看待《水浒传》的其他特点，尤其是李逵、武松和鲁智深等

数位顶天立地的好汉的形象，已经以及还会继续在读者中所造成的影响。

我们的读者不应匆促接受某些“新起”的观点，对《水浒传》下最后的结论前，考虑双翼的下面几段话，应该会有所得的：

“由于《水浒》成书过程的复杂，它表现的内容也复杂。”（摘自《宋徽宗一梦》）

“小说的作者，……要把《水浒》的一百零八人全部改写不容易，就抓住主要的一个：宋江，把他写得不成样子！”（摘自《顺天前后》）

“《水浒》的吸引人之处，仍是那些好汉们，如何敢于起来反抗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生龙活虎，大干一场。因此，前七十回，始终是最受欢迎的部份，那些形象，也最突出，最鲜明，活跃在我们的心中。”（摘自《宋徽宗一梦》）

×

×

×

在这两年出现的分析《水浒传》的文章里，有好些强词夺理，指鹿为马的说法。下面就举一个例子：

宋江在浔阳楼的两首诗，是不是反诗？包括在《中学课外阅读文选》专辑中的一篇专题，认为不是反诗，不然则与宋江一贯搞“忠义”、搞投降的言行相矛盾。

专题的作者说：“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这两句诗的本意是表示宋江要杀农民革命军，因为他们从根本上阻碍他忠君保皇。并举他后来征方腊时，就曾发誓杀尽贼军的例子来说明。

另两句：“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则解释为由于黄巢是自刎而死，且与“光耀祖宗”、“封妻

荫子”无缘，因此宋江就敢看轻黄巢了！

前两句的解释实在荒唐！作者忽视了这两句诗前后的联系，只认定宋江是投降派，就胡乱引申，大放厥词。宋江虽是投降派，就不允许他想杀几个贪官污吏，以报一己之私仇吗？

后两句的解释，还说得通。然而我以为原作者是有意要宋江自比黄巢，成为黄文炳抓他的把柄，为后来的故事埋下导火线。却不是象上述引书中所说的：黄文炳没有看懂宋江这两首诗的用意，而误解了宋江其人。即使施耐庵替宋江写的诗有引人误解之处，施耐庵安排黄文炳来读“反诗”的目的却是很清楚的。如果黄文炳误解了这首诗，书中一定有交待，不然的话，误解从何说起！

×

×

×

施耐庵写《水浒传》当然有反映了自己的阶级立场，也不可避免的反映了革命队伍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可是他并没有意识的去写阶级斗争，去写路线斗争。因此，利用现代的创作理论去追寻《水浒传》的路线斗争的线索，在面对大量的互相矛盾的事实时，就只得假装看不见，或者加以歪曲，以求自圆其说了。

他们先把宋江和卢俊义等人称为投降派，再把晁盖、吴用、三阮和李逵等人称为革命派，因而引出了《水浒传》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晁盖是革命派吗？他们的一个根据是作者有意屏晁盖于一〇八人之外。但是，历史上没听说过有晁盖这个人，不知有什么政治理由，作者非去掉晁盖不可呢？作者花很少的篇幅刻划晁盖，甚至要晁盖早死，这虽和《大宋宣和遗事》不同，但是如果把这理解为作者安排故事的需要，

那么一切就显得自然，说得通，就象王进，只在第二回出现一样。

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是路线斗争的表现吗？其实，晁盖上梁山前，梁山已经有了聚义厅，后来宋江做了大头领，便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件事与突出全书的忠君思想是有关的，然而却无法说明晁盖是革命派，是与宋江对立的。

第二十回，晁盖打退了官军后，就这么说：“我等今日初到山寨，当初只指望逃灾避难，投托王伦帐下为一小头目。”晁盖的凌云志是什么？

再说白胜挨不过酷刑逼供出卖晁盖，晁盖不但不追究，还托人救他，作者又那里有意把他写成革命派呢？

第五十五回，晁盖设计抓了凌振，彭玕帮忙劝他投降：“晁、宋二头领替天行道，招纳豪杰，专等招安，与国家出力。”也不见晁盖反对彭玕的说法！

第六十五回，还特地写晁天王梦中显圣，救了宋江一命，这又那里有水火不相容的影子？

说回晁盖丧命的那一回。有一篇文章竟然说晁盖是为了重新掌握革命的领导权，才提出攻打曾头市。后来，晁盖不管林冲的劝说，深信两个奸细的话，决定亲自率军劫寨，结果中了埋伏。在劫寨之前，他对林冲说：“我不自去，谁肯向前？”这八个字，按照情节的发展来看，是很自然的，因为林冲等将领都怀疑那两个来献计的人是奸细，不赞成深夜劫营的计划，因此他不领兵去，叫谁去？可是，有人却是这么分析的：“这八个字一方面表明时至此时，宋江羽翼已成，晁盖大权旁落，已经很难指挥得动全局了；同时，也表明了晁盖为了坚持革命路线，身为主 75

将，决心甘冒矢石之险，力求通过战斗重新树立革命派的领导权威。从这个意义上讲，晁盖之死，与其说是死于史文恭的毒箭，倒不如说是死于宋江投降路线的干扰和排斥。”如果参照原文来看，你真会佩服其想像力之丰富！

这些文章，还极力指责施耐庵对晁盖革命路线的极端仇视，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必然对晁盖等人产生反感，甚至仇视，然而有那一位普通读者会有这样的反应呢？

×

×

×

三阮也是革命派？

三阮在第九十回联合了李俊、张横和张顺，对军师说：“朝廷失信，奸臣弄权，闭塞贤路，俺哥哥破了大辽，止得个皇城使做，又未曾升赏我等众人。……今请军师自做个主张，和哥哥商量，断然不肯。就这里杀将起来，把东京劫掠一空，再回梁山泊去，只是落草倒好。”这种说法，是真的革命派吗？

第九十六回，阮小二自刎而亡，宋江寝食俱废，梦寐不安。阮小五和阮小七劝道：“我哥哥今日为国家大事折了性命，也强似死在梁山泊埋没了名目。”这里有没有革命派的思想？

再说回三阮参于起义之初，抗拒何涛带领的官兵追捕时所唱的歌，不知道为什么，却不见一个鼓吹路线斗争的作者提起：

“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

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老爷生长石碣村，稟性生来要杀人。

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与赵王君！”

三阮在一些反抗官兵的场合中表现的造反精神，是令

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然而要正确的分析三阮的思想和性格，上面的例子是否可以置诸不顾呢？

×

×

×

吴用也是革命派，那真是天晓得！

就先说第九十回里，三阮等虽对吴用说了那一番话，吴用也向宋江反映，然而吴用并不敢自作主张，而且也不敢正面提起。

再如第六十回，李逵说宋江也可以做大宋的皇帝，便受到宋江和吴用的喝斥，吴用骂他不识尊卑。同一回，宋江和吴用听了一个和尚的话，都同时说道：“你看，我们未老，却凭地忘事！北京城里是有个卢大员外，双名俊义，……梁山泊寨中若得此人时，何怕官军缉捕，岂愁兵马来临！”后来吴用还主动献计，赚了玉麒麟上山。可是却有一大堆文章，把这件事只说成是宋江要拉拢地主阶级分子，以壮大自己的势力的例子！

第七十五回陈太尉奉旨要来招降宋江等人，吴用说：“论吴某的意，这番必然招安不成。……杀得他人亡马倒，梦里也怕。那时方受招安，才有些气度。”吴用反对招安吗？

阮小七换御酒，是众好汉吓跑陈太尉的导火线，可是从原文来看，全是阮小七的主意，与吴用无关，不过为了把吴用说成是革命派，就有论者硬说是吴用指使的！

第八十三回宋江在陈桥驿滴泪斩小卒，是渲染得最凶的一件事，然而那类评论者却不愿指出这是吴用的主意。原来当宋江听了这消息感到大惊时，吴用便说：“省院官甚是不喜我等，今又做出这件事来，正中了他的机会。只可先把那军校斩首号令，一面申复省院，勒兵听罪。”且

不论吴用出的主意对不对，可确实是他出的主意。

还有一件事应该也在此一提的，那是写在第八十五回的故事。辽主出高价欲收买宋江，吴用便说：“我等三番招安，兄长为尊，止得个先锋虚职。若论我小子愚意，从其大辽，岂不胜如梁山水寨。”吴用是革命派吗？

×

×

×

李逵一路来都被认为是性格最粗犷，造反性最澈底的人。宋江在大聚义后，几次提起招安，李逵都直率的表示反对，即使死后也要操起板斧吓醒了宋徽宗。然而从书本上的李逵看，也不是什么革命派。

第七十一回李逵大闹菊花会，宋江本欲杀他，在众人恳求下，改成囚禁之罚。有几个当刑小校向前来请李逵。李逵道：“你怕我敢挣扎？哥哥剐我也不怨，杀我也不恨。除了他，天也不怕！”后来，宋江被奸臣暗害，命在旦夕，便设计给毒酒李逵喝，临别之前才告诉他真相，李逵便说：“罢，罢，罢！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李逵对宋江的服贴，甚至被他害死也无怨，这种思想不也正是忠君思想的翻版吗？

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的第九十三回，李逵做了一个梦，正在追杀强盗时杀到皇宫来了，只听得有人喊他快点跪下，他一看是皇帝坐在殿上，赶快照例拜了几拜，就做了值殿将军。李逵的造反精神，不也渗杂有别类货色吗？

其实，作为一部几百年前的文学作品——《水浒传》，一定不可能完全符合现代的政治与创作观点。如果从《水浒传》里，发现了古代农民起义中的路线斗争的痕迹，便企图把其中的人物分成泾渭分明的两派，把偶而表现出来

的路线斗争，当成是贯串全书的中心思想，那么这类形式主义的评论，在还没有窒息《水浒传》以前，就先挖好自己的墓穴了。



后 记

前个时候，因为要推销一些戏票，找了几位老朋友。有的感到很诧异，我竟然还涉足在这个圈子里。他们还感叹的说这是有闲人的玩意。

我不怪他们的“直率”，因为他们的确是很忙碌的人，除了工作外，晚上还有各种应酬和娱乐——据说这类活动很重要，都能赚钱。因此，想想，也的确只有我这种有闲的人，才能对文化活动念念不忘，对书本不忍释手。

这种自我安慰，其实还有自鸣清高之意。然而，如果对另一些朋友来说，却显得贫乏无力，甚至是无耻了。

这些朋友除了工作赚取生活费用之外，其他的时间都用在大众的事业上。他们不象我一样，全担的是风险的事，真的把青春献给了祖国。因此，别的不说，收在这本集子里的这些可有可无的文章，难道不是有闲的人才写才看的玩意儿吗？

× × ×

可是，我还是把这些文章付梓了。无他，敝帚自珍而已。

× × ×

协助出版的朋友，却是以当前出版界的状况为出发点的。他们相信这本小册子，还有一部分人愿意看。

那么，身为作者的我，除了感谢读者外，也不敢奢求了。

（附识：由于英文的差劲，作者对某些著作的理解错误，或者错译了某些原文，在所难免，请指正。）



定价：星币一元正



甘榜云版社